

**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作研究**

China's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王 锦

WANG, Jin

硕士

MA (By Thesis)

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09



CERTIFICATE OF AUTHORSHIP/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the work in this thesis has not previously been submitted for a degree nor has it been submitted as part of requirements for a degree except as fully acknowledged within the text.

I also certify that the thesis has been written by me. Any help that I have received in my research work an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hesis itself has been acknowledged. In addition, I certify that all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literature used are indicated in the thesis.

Signature of Candidate

Production Note:
Signature removed prior to publication.

致 谢 辞

本文是我于 2007-2008 年两年期间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完成的研究成果。2008 年 10 月向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导师们提交初稿，并在导师的帮助下进行修改，于 2008 年 12 月完稿。

在澳大利亚学习和研究的时间内，我得到了老师们和教授们的关心、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冯崇义博士对我的论文进行了细致的指导和帮助，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我很难在一年多时间内完成这一论题的硕士论文。对他们的帮助和指导，我表示由衷地感谢。

在这两年里，我阅读了国内外有关区域合作理论的大量著作，参阅了中外经济学专家的大批论文，特别是有关区域分工理论、区域合作动力学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等著作和文献，掌握了大量与中国云南省参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关信息和资料。这些信息与资料对本人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帮助很大，本文的顺利完成还要感谢曾经帮着我提供这些书刊、论文和资料的专家、学者和朋友。而且，我也借此机会，对论文研究过程中给我提供直接和间接帮助的亲人、同事和朋友，尤其是杨添富老师、何敏老师等表示衷心的感谢。谨将此论文献给哺育我健康成长而不辞辛劳的母亲，她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国汶川大地震中不幸遇难。我每前进一步，都深切地感受到她在天堂投向我关切而鼓励的目光。母亲与我同在。

CERTIFICATE	1
致 谢 辞.....	2
摘 要.....	6
ABSTRACT	7
第一章、绪 论	8
第一节 选题意义	8
第二节 主要内容和目标	9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9
二、研究的主要目标	10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10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10
二、论文分析的思路和框架	10
第二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基础分析	12
第一节 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简述	12
一、区域和区域经济合作	12
二、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简述	13
(一) 区域分工理论	13
(二) 区域经济合作动力学说	15
(三)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16
(四) 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	18
第二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历程和合作机制.....	18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	18
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合作机制.....	20
(一)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GMS)	20
(二) 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 (ASEAN—Mekong Ba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MBDC)	21
(三) 新湄委会主导的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	21
(四) 中、老、缅、泰毗邻地区“成长四角”	21
第三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21
一、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合作意识的形成与巩固.....	22
(一)“东盟意识”的形成	22
(二)“东盟意识”的扩展	22
二、湄公河次区域五国经济合作的现实动力基础.....	24
(一) 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	24
(二) 强烈的合作愿望	25
(三) 泰国在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推动作用.....	26
第四节 亚洲开发银行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27
第五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特征和面临的问题.....	28

一、组织特征——松散型	28
二、面临的问题	29
小结	34
第三章、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36
第一节 中国加强同东盟经济合作的动因分析	36
一、“两个环境”	36
二、“三个基础”	38
(一) 政治基础	38
(二) 经贸基础	39
(三) 文化基础	42
三、“两个事件”	43
第二节 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基础	44
第三节 战略利益观——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观	47
第四节 中国云南省的后发优势与空间区位优势分析	49
一、关于“后发优势”	49
二、区位和空间区位	51
三、中国云南省的“双向桥头堡”作用	52
第五节 区位比较优势转化为区位竞争优势研究	53
一、区位优势和区位优势	53
二、向高效率区位优势转化——中国云南省的态度取向	54
小结	54
第四章、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竞争优势实现的途径研究	56
第一节 区位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56
一、提高交易效率的基础和条件	58
二、打破地区封锁，发展国内区际贸易	59
三、“走出去”——企业提高交易效率的有效途径	61
第二节 初级区位优势向高级区位优势转化	65
一、高级区位优势实现的空间架构	68
二、吸引投资——中国云南省高效率区位优势实现的重要环节	70
第三节 政府在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73
一、第一推动力假说	73
二、政府的主要作用	75
(一) 纠正部分机制失灵	75
(二) 积极服务于企业“走出去”的制度措施	77
(三) 努力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77
(四) 通过产业发展政策，构建区域优势	78
(五) 优化云南的法制环境框架	78
小结	78
结 束 语	80
一、基本结论	80
二、主要创新	81
三、不足之处	82

参考文献..... 83

摘 要

本文系统论述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深化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运用区域经济学的有关前沿理论,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基础、合作的动力机制、发展形式以及合作内容等进行了分析。作者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贸易和投资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文章认为,由于次区域总体基础设施条件滞后,亚洲开发银行主导次区域经济合作就有其必要性。作为松散的国家间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既有战略性的也有现实中的。

本文的核心是对中国云南省参与和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分析。文章提出,战略利益观是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石。通过对中国云南省的区位优势为什么能成为优势的分析,指出中国云南省最大的优势就是“双向桥头堡”的国际大通道优势。立足此优势,中国云南省的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向区位优势竞争优势转化成为现实选择。一是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二是低成本的初级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区位优势竞争优势的转化。文章认为,交易效率是影响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并指出中国云南省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国内区际贸易和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三条途径实现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文章指出,持续的创新是高效率竞争优势实现的关键,需要通过产业集聚的外部性获得持续创新的各项因素。一方面要构建产业集聚的空间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具有导向性的产业投资政策,吸引国外和省外的外部投资以及非公经济成份的投资来获得产业集聚的外部效益。最后,文章指出政府在中国云南省实现竞争优势的“两个转化”中应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和为区域创新发挥航标灯的作用。

关键词 : 云南、大湄公河次区域、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竞争、交易效率、产业集聚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Yunn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important issue. Applying relevant theories about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thesis examines in a systematic way the foundation, dynamics, contents and forms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It traces three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pointing out that Asia Development Bank has played a key role due to under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region. It also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lying ahead of this loo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core of this thesis i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Yunn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findings include: Yunnan's participation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interests; the greatest of advantage of Yunnan lies in its geographic position as a "two-way bridgehead" on the international thoroughfare;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s key for Yunnan to translate its geograph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to geographic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cluding prim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low costs and higher level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efficiency; Yunnan needs to adopt several strategies such as better infrastructure, more inter-provincial trade, expansion of its enterprises beyond the borde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cluster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y;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guidance for innovation.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我们面临的机遇既包括国内经济建设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机遇，也包括全面发展对外关系的机遇。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空前加深。尤其是在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区域化进程异军突起。WTO 公布的数据表明，截止 2007 年 7 月，报告给 WTO 的区域贸易协定达 380 个，其中，正在实施的 205 余个。区域贸易协定内部的贸易总量占到全球贸易总量的 2/3，其中北美和欧盟的区域内部贸易量超过了世界贸易总量的一半。^①中国也以较快的步伐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

2001 年 11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文莱出席第五次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英文缩写为“ASEAN”）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将在 10 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双方加强经贸合作的共同愿望。2002 年 11 月，朱镕基总理在金边出席的第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与 10 国领导人就《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达成一致。在金边，朱镕基总理参加了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并与其他 5 国领导人签署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联合宣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应发挥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双方已将其作为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其战略地位也发挥了重要变化。

温家宝总理参加了 2005 年和 2008 年两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第二次领导人会议确立了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注重实效、循序渐进”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指导原则，次区域合作由此迈上新台阶。第三次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加强联系性、提升竞争力”的主题，就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运输便利化，构建伙伴关系、促进经贸投资，开发人力资源、增强竞争力，可持续的

① 刘方、张立韬：《区域贸易协议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 1 月。

环境管理，次区域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等六大方面的合作构想交换意见。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实质性合作阶段。

世贸组织总干事素帕猜曾说过：“中国和她的邻国之间的一个潜在的合作区域是大湄公河流域该区域包括中国西南省份—云南。”^①位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结合部的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缘环境，成为中国在该区域经济合作的参与者，从 1992 年就开始作为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体，参加了亚行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多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当前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以及坎昆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全球化的贸易自由化前景难测，区域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的建设，中国云南省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冲击。2002 年中国政府提出次区域合作的目标是“把湄公河次区域构筑成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把湄公河次区域构筑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

中国云南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环境等方面都具备一定的基础，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和合作的进行，必将成为中国与次区域国家，乃至整个东盟各国更为便捷的国际大通道。此外，在积极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中国云南省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由于优势相似，竞争激烈。2003 年 10 月 8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议，“为促进双方商界合作，中方建议从 2004 年起每年在中国广西南宁市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②这使得中国云南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上的优势被淡化。2004 年 12 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第十三次 GMS 部长会议上，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提出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面对对外开放中激烈的竞争形势，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今后该如何进行？前景怎样？作为中国云南省如何在次区域的合作中不但推进合作而且发展自己，这正是本文所要探索的问题。

第二节 主要内容和目标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是一篇应用性论文。文章以区域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为指导，围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合作基础推动力和组织形式，以及面临哪些问题等等为主要

① 《广西“东盟热中的冷思考”，新华网广西频道 12 月 11 日电。

② <泰>素帕猜·巴尼巴滴和<美>马克·克利福德：《中国重塑新世界》，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9 页。

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就中国云南省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如何实现自身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研究的主要目标

通过对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本文力图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通过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分析，找出该合作机制区别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特点，指出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问题；同时，提高人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注度，增强次区域各国的合作意识。

针对中国云南省在次区域合作中所具有的特点，提出中国云南省参与和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思路，为云南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通过对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推动中国周边次区域经济合作。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经济学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从理论高度进行一般化的抽象、概括和总结，紧密结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实际的分析，从而探寻中国云南省如何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并发展自己的发展思路。

二、论文分析的思路和框架

本文的思路是：通过理论综述，构建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框架。在此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具体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行了分析。然后重点分析了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主体的中国云南省如何认识到自身的区位优势，并使区位优势转化为高效率的竞争优势的问题。文章指出，高效率竞争优势的实现要经过“两个转化”：一是区位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二是低成本的初级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区位优势转化。文章提出了实现这两个转化的具体实现途径，并指出政府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提出了本文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第二章首先在界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内涵的基础上，文章从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内容出发，构建了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框架，其主要包括：国际分工理论对区域经济合作根源的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对产生区域合作动力和机制的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程和组织形式的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区域经济合作核心内容的研究。文章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评述。

第三章是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章提出了中国云南省参与和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顺利进行的基本指导观—战略利益观。文章认为这既是中国和平崛起大背景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而且，这一合作观应该成为次区域各国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石。然后，文章分析了基于后发优势基础上的中国云南省的空间区位优势，并指出，中国云南省具有“双向桥头堡”的国际大通道优势。因为中国云南省的区位符合了国家对外合作战略的需要才成为优势。建立在空间区位优势上的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比较优势面临着次区域其他国家低成本比较优势的挑战，因此，由区位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就成为中国云南省的现实选择。

第四章是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竞争优势实现的途径研究。一是区位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二是低成本的初级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区位优势竞争优势的转化。文章认为，交易效率是影响区位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并指出中国云南省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国内区际贸易和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三条途径实现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文章指出，持续的创新是高效率竞争优势实现的关键，需要通过产业集聚的外部性获得持续创新的各项因素。一方面要构建产业集聚的空间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具有导向性的产业投资政策，吸引国外和省外的外部投资以及非公经济成份的投资来获得产业集聚的外部效益。最后，文章指出政府在中国云南省实现竞争优势的“两个转化”中应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和为区域创新发挥航标灯的作用。

最后是文章的结束语部分，概括了文章的基本结论和主要创新以及不足之处。

第二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基础分析

第一节 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简述

一、区域和区域经济合作

对于区域，存在不同归类与理解。通常可分为三个类型：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区域；由几个国家构成的经济区域；几个国家部分地区共同构成的经济区域。^①第一类如中国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美国大湖工业区等；第二类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第三类如澜沧江—湄公河经济合作区、图们江经济合作区等。本文选取的区域应该属于第三类。

虽然我们明白区域所指的内容，但是要给区域下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却非常困难。区域这一概念含义不清主要是由于区域的规模可大可小，这主要取决于所研究问题的范围和类型。H. 西伯特 (H. Siebert) 在《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与政策》一书中将区域作为一个中间性范畴描述。他认为，一个区域概念是一个中间范畴，他介于无空间的总量经济与定义为一系列空间点的高度分散的经济体系之间，是一个类型于部门的中间范畴。^②这一概括太过抽象，用不同的标准就产生了许多区域分类与划分的方法。

选择区域划分的标准不是任意的，而是要根据研究课题提出的任务的要求。通常我们把一些地区单位综合为一个区域，即它们在主要方面更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由此产生了划分区域的两个标准，即：(1) 同质性标准；(2) 功能性标准。

根据同质性标准，我们可以把那些根据一定的指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地区单位综合为一个区域。根据功能性标准，我们可以把那些根据一定指标相互之间具有特别紧密联系的地区单位综合为一个“功能区域”。当然，这两个划分标准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结合在一起运用的。本文研究的区域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的 6 国或地区，一是根据它们地理位置的同质性，都属于中南半岛且澜沧江—湄公河流经几乎所有国家；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同质性，该区域除泰国外，都属经济落后或十分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而且，遵照国际上对这一区域的通用惯称。这种划分达到了简化复杂现实的目的，而且对研究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影响不

^①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12 月版，第 1 页。

^②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12 月版，第 2 页。

大。

本文所谓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概括为有一定地缘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拟定共同的行动准则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消除区域内国家间的贸易障碍，实现区域内国家互惠互利、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协作活动。

二、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简述

笔者认为，目前对国家间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主要应涉及以下几个内容：

1、对区域经济合作原因的研究。为什么区域间要发生联系？为什么区域间要产生经济上的合作关系？这部分研究是对产生区域经济合作的客观性的研究。国际分工理论对其作了很好的解释。

2、对产生区域合作动力和机制的研究。区域间虽然有产生经济合作的客观基础，即有了必要条件。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没有现实的动力去推动它，这种合作也只能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对产生区域合作的动力和机制做出了解释。

3、对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程和组织形式的研究。一般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建立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共同体是其终极目标。然而，在向这个目标发展的进程中，发展的基础和发展的步伐是不一样的，也就出现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无疑是对处于后发展形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一个很好的借鉴。

4、对区域经济合作内容的研究。区域经济合作既然是一种经济协作活动，那么要协作什么东西？或者说，协作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结合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现实，我们发现国家间是因商品或服务贸易而发生着经济联系，以生产要素的流动为载体。也就是说，国际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投资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国家或区域间所要协调的就是在不断发展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其关键是协调如何提高国家或区域间的交易效率，推动贸易和投资的增长。

对以上相应内容的实证研究构成了我们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以下相关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综合运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一）区域分工理论

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分工。区域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区域分工亦称劳动地域分工或地理分工，是社会分工在经济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确切的说，它是指一个地区为另一个地区生产产品并相互交换产品的现象。

一般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开创了区域分工理论也是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先导。斯密根据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原理，创立了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古典“地域分工”理论。有以下三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即绝对优势、市场扩张和剩余外溢。^①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斯密的区域分工理论，这一理论所反映的绝对优势，是包含绝对成本在内的多因素的综合，因而它不仅能解释不同劳动生产力水平国家之间的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模式，也可以解释相同劳动生产水平国家间的现代水平型分工模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区域分工的研究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国际区域分工的基础和决定力量。（俞进，2003）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界尤其是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区域分工理论时，都将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广义的国际区域分工理论来看。在这里笔者从狭义的范围来理解，即区域分工理论是产生国际区域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基础的理论。在经济学界真正继承和发展斯密最核心的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是由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他们看来，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虽然马歇尔也认识到了作为斯密核心的分工与专业化的组织问题，但是由于数学工具的限制，它未能进一步洞见其本质，只好借助现有的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而大有所成。经过萨缪尔森的发展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

新兴古典经济学复归了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并阐述了区域分工的内生演进过程。如图：^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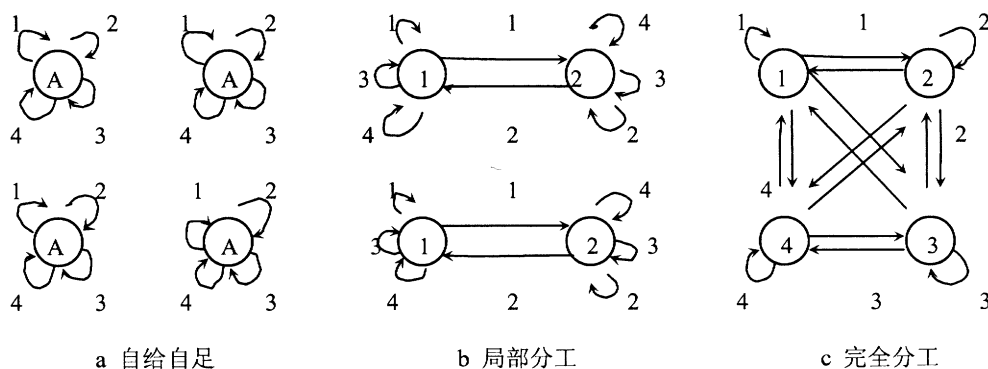


图 2.1 分工的内生演进

图 2.1 中讨论了 4 种产品是分工的内生演进过程。线条表示产品流，小箭头表示产品流方向，线条旁

① 俞进：《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2003 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 16 页。

②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5 月版，第 15 页。

的数字表示相应的产品，带数字的圆圈表示出售产品的个人。图 a 中表示自给自足，因为交易效率低，其中每个人都自给 4 中产品，形成 4 个贸易区；图 b 能够表示部分分工，因为交易效率有所提高，其中每人出口一种产品，购买一种产品，自给三种产品，形成三个贸易区；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图 c 每人出售一种产品，购买三种产品，自给一种产品，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

在完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不存在市场，因为无交易费用，由于没有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每个人的生产率低下；在局部分工的条件下，由于分工使得专业化水平上升，生产效率提高，市场出现，交易费用从无到有；在完全分工的条件下，每人专门生产一种产品，个人的生产率提高，贸易依存度上升，市场个数增加，经济一体化和生产集中化程度提高，交易费用上升。因此，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效率和市场结构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区域分工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原因和基础。由于分工是一种组织结构，它以专业化为基础。区域分工作为分工的空间形式，也是建立在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的。而作为专业化生产的区域不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也不可能只生产不消费。区域主体必须通过区域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区域经济利益。这种区域经济利益是一个整体利益而不是个别集团或部门的利益，作为整体利益的主体，其区域经济利益具有区内共享性和区际排他性。这样区域之间的竞争将不可避免。有竞争就有合作。通过合作，区域主体不仅提高了整体实力而且降低了区域之间的交易成本，实现了区域整体福利最大化。因此，可以说，区域分工的存在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利益，共同的区域经济利益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础。

区域经济合作深化了区域分工。区域经济利益是区域分工的根本动力。区域主体之间按照一定的原则，从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深化合作的内容和领域，在不断加深的合作中获取区域的比较经济利益。而这种利益的存在，又会促进区域生产率的提高，增强区域的竞争力，从而推动区域更高层次的专业化生产，深化区域分工。

（二）区域经济合作动力学说

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大体存在三种不同的流派。^①

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其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主张产权至上，市场万能。即

^① 本部分参考了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前言的部分内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只要社会上每一样东西的所有权和收益权是清晰的，追逐私利的个人或团体就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进行交换和合作。因为交换和合作是不断重复的，因此每一个个人或团体都会自觉地接受相互间达成的合作契约。这就是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它是以充分信息、市场不存在垄断、交换不存在交易成本、个体选择不存在外部性为假设前提的。在此情况下，政府对市场是不需要进行干预的。在这些问题存在的情况下，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即建立相应的制度，以解决合作所需的信息沟通问题，以便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来促进合作，但政府的所作所为其目的不是代替市场，而是要更好地促进市场的运作，这就是所谓的现代自由主义。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国家间区域合作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国家间互通有无的需要，政府提供的只是一种制度便利。推动区域合作不断前进的是一种合作的外溢机制，即一个领域合作的成功可以使人们养成合作的习惯，积累合作的经验，从而推动合作程度的不断深化和合作范围的不断拓展。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其最核心的一点是，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它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追求自己的最大权利，合作不过是增强自己权利的一个手段。根据其理论观点，国家间的区域合作的动力来源于国家对自己安全的追求。根据不同的情况，一个国家可能会采取制衡政策，即与其他弱小国家合作，制衡一个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采取顺风使舵的政策，即与最大的国家结盟，来保证自己的安全。相对平等地分配合作收益是合作得以持续的一个主要因素。作为一个流派，建构主义最核心的一点是强调国际文化即国家间对彼此的认识以及它们之间共有的认识，是决定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最主要的因素。该学派认为共同的认识是合作的动力。合作固然有收益的分配问题，但合作成员出于对自己的身份的自觉意识和对自己行为的相对克制是区域合作能够得以持续的主要因素。合作意识的不断深化和扩展是合作不断深化和扩展的主要因素。

应该说每一种区域合作是以上三种动力来源的综合。尽管它们对与区域合作动力的解释各有择重。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伴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构成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程和组织形式研究的理论基础。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的划分；二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研究。下面我们分别进行概括：

1、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划分

按照贸易自由化和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差异，一般学者把区域经济合作分为六种形式：①优惠贸易安排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PTA)；②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Area, FTA)；③关税同盟 (Customs Union, CU)；④共同市场 (Common Market, CM)；⑤经济联盟 (Economic Union, EU)；⑥完全的经济一体化 (Complete Economic Integration)。其具体特征比较如表 1.1 所示：

表 2.1 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主要形式比较

区域经济合作形式	优惠关税	商品的自由流动	共同对外关税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经济政策的协调	超国家经济组织
优惠贸易安排	√					
自由贸易区	√	√	√			
关税同盟	√	√	√	√		
共同市场	√	√	√	√	√	
经济同盟						
完全的经济一体化						√

(刘力、宋少华：《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新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 6 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的特征差别，正好从纵向反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如果我们横向对比来看，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正好为我们展示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通过对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总结其经验得失，可以为后发展经济合作组织提供很好的借鉴。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分析概述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不少经济学家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和论证，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及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方法。其中关税同盟理论 (Theory of Custom Union) 是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最具代表性的。

关税同盟理论是由维纳 (Viner) 于 1950 年提出的。他不认为建立关税同盟一定能使成员国的福利增加。他提出了“贸易创造” (trade creation) 和“贸易转移” (trade diversion) 两种效应^①。他认为建立关税同盟得益与否取决于

^① 贸易创造效应指在关税同盟内实行自由贸易后，国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国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从成员国进口增加，新的

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比较效应相互比较的实际结果。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何许多国家对组建关税同盟感兴趣的问题。为此，库珀和马塞尔（Cooper and Masell）提出，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成为关税同盟成员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组成关税同盟可以减少工业化的成本。^①

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静态效应，当然它还带来了动态效应。从动态角度看，关税同盟通过形成规模经济、竞争加强带来的效率变化和 investment 变化来影响成员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以西托夫斯基和德纽为代表的大市场理论正是从动态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经济效益。以日本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则从规模经济是生产成本降低的角度探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产生的根源。

（四）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

如果从广义的区域分工理论来看，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都属于区域分工的理论的范畴。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在形式上虽有所差别，但是其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调整方向趋同，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趋同，大有融合趋势。如果回顾两者的发展过程，其实它们都是国际区域分工的结果。在当代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他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其理论的综述可以让我们把握区域经济合作本质内容，在持续的经济协调活动中，深化经济合作内容，迈向经济一体化。

（详见陈洁蓓、张二震：《从分歧到融合——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发展趋势综述》，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三期）

第二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②经济合作发展历程和合作机制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并非从经济合作开始的，最初的范围也并不包括整个次区域的六国。笔者根据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贸易得以“创造”；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对外实行共同关税，对第三国进口形成歧视壁垒，导致外部进口减少，转向从成员国进口，发生贸易“转移”。

^②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5页。

^①在论文中，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在地域范围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文中所指的内容却有所不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在文中指，该区域内所有合作机制的泛称；而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则是对亚行主导的合作机制的特指。文中一般将两者简称为“次区域”。另外一个“湄公河次区域”指的是除中国云南外的中南半岛五国。

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初。这一阶段是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起步发展阶段。合作的地区范围是从湄公河下游开始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5 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报告，提出合作开发与利用湄公河下游的水能资源，该计划被称为“湄公计划”。1957 年 3 月，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举行了第 13 次年会，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发表了联合公报，提出联合开发利用湄公河。同年 9 月，成立了湄公河委员会，并在亚洲经济社会发展理事会的主导下运作，该委员会还得到了 30 个合作国、17 个国际组织和 6 个国际金融组织机构的协助。40 年来，湄公河委员会对湄公河下游地区的开发利用进行了大量勘测、测绘、分析、研究、论证，并将一些项目付诸实施。由于该地区长期处于战乱状态，“湄公计划”进展缓慢，湄公河的国际合作开发陷于停滞。不过，1957—1988 年湄公河委员会共筹集到 4.2 亿美元的捐款，捐款主要来自联合国开发署、荷兰、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其中，2.68 亿美元用于工程建设投资，1.52 亿美元用于进行投资前的调查和制订计划工作。

第二阶段：从 1992 年到 2002 年，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繁荣发展阶段。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全球冷战的结束和地区局势的缓和，湄公河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重新活跃起来。湄公河沿岸国希望通过发展国际化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纷纷参与该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由此形成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多种合作机制并存的局面。主要有：由亚洲开发银行推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湄公河委员会主导的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由东盟领导人发起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由泰、老、缅、中政府发起的“黄金四角”区域经济合作、由日本外务省主持的印度支那综合开发计划、由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和日本通产省联手的柬、老、缅经济合作工作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多边组织的合作开发计划等。这一阶段的合作地域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次区域的六国，合作的领域也由原来的水资源利用协调合作扩展到经济合作等多个领域。

第三阶段：2002 年至今。2002 年 11 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了首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领导人会议，这是湄公河开发史上最高级别的会议，会议批准了大湄公河次区域未来十年发展战略框架报告，标志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入实质性合作的新阶段。六国领导人承诺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和各国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能源开发，调动私营部门参与合作，推动贸易与投资，并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也被纳入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成为中国与东盟五个重点建设合作领域之一。2003 年 4 月，在曼谷举行的关于 SARS 的东盟特别领导人

会议上，泰国总理他信提出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四国实施经济合作战略行动计划（ACMECS）。同年11月12日，在缅甸蒲甘四国领导人签署了《蒲甘宣言》，确定在五个优先领域实施合作战略行动计划，即贸易和投资、农业和工业合作、交通网络、旅游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确定了46个共同项目和224个双边项目。次年越南加入该合作战略计划。该经济合作战略旨在通过成员国的自力更生和共同繁荣增强自身竞争力，创建和平的政治环境发展经济，来缩小同东盟其他国家的发展差距，为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而努力。

从以上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的结束和地区局势的缓和是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条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扩展：一是合作领域的扩展，由水资源的协调扩展到经济领域等的全方位合作；二是合作地域的扩展，从湄公河下游扩展到湄公河上游，从中南半岛到中国西南地区，经济合作容量不断增大。就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来说，全方位的积极的经济合作从2002年开始。因为在这之前，中国虽参加了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新湄公河委员会等各种合作机制，但是在合作的态度和内容上，中国都显得比较被动。从2001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到2002年中国和东盟领导人正式确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中国加强周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步伐加快。这也就决定了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主体的云南省和次区域五国的经济合作在2002年之后才有了明确的方向，才开始了大规模实质性合作。因此，以下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基础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包括两部分，即次区域五国的合作基础及动力机制和中国与次区域五国的合作分析。

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合作机制

目前该次区域主要的合作机制有四个：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GMS）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是由亚洲开发银行于1992年根据该银行成立时制定的宗旨，和章程中关于促进该银行发展中国家成员间合作的授权，并为贯彻该银行于1991年通过的中期发展框架性计划，经与湄公河沿岸中、柬、老、泰、缅、越等六国进行一系列磋商后发起的。旨在改善本区域基础设施，扩大贸易与投资合作，目前已先后开过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并于2002年11月3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了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合作范围涉及交通、通讯、能

源、旅游、环境、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禁毒等八个方面，筛选出 100 余个优选合作项目。为扩大大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并从多方面吸引投资，在亚行的推动下，由亚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投资组织先后在区内外多个城市举行过本区域合作优选项目投资机会研讨会。

（二）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SEAN—Mekong Ba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MBDC）

由东盟主导，原东盟七国和中、缅、老、柬共 11 个国家为开发合作的核心国，并欢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和一些国际性或地区性金融组织和机构参与。合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交通、通讯、灌溉、能源）、投资与贸易、农业、林业、矿产资源产业、工业及中小企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科技等八个方面。这一合作机制的形成与运作，表明澜沧江—湄公河开发合作已作为东盟经济政治一体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合作范围已超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

（三）新湄委会主导的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

1995 年，在湄公河工作小组的基础上，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四国在泰国清莱签署了《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并正式成立了新湄公河委员会。新湄公河委员会完全是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四国主导的地区性组织，其宗旨是对湄公河的水资源和相关资源以及全流域的开发制定计划并管理实施。新湄公河委员会成立后，每年都制定项目计划，并积极寻找国际援助。新湄委会成立以来获得了一些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援助。

（四）中、老、缅、泰毗邻地区“成长四角”

这是四国有限地区的小区域合作。最初由泰国于 1993 年提出，又称“黄金四角计划”、“五清沟通计划”（清迈、清莱、景栋、景通、景洪。在泰语中，景与清同），其宗旨是建设中国西南通向中南半岛的陆上通道和“经济走廊”，实现两大市场的对接，并促进小区域内的发展。

第三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从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来讲，我们所指出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范畴，只不过这里是一个特定的称谓。我们可以将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义简单的理解为基于一定地理范围的若干独立国家（这里主要是指国家中央政

府)为了达成某种目标而进行的经济协调活动。这种目标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安全的;经济协调活动既可以是松散的、相对独立的政策协调活动,也可以是朝向一个经济共同体而采取的一体化活动。^①对于一个具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来说,存在一种共同的经济利益或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其他安全利益等,这是合作的基础,是可以协调的利益,否则,就谈不上合作。区域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如果说行为体共同的命运和相互依存提供了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基础,那么行为体的同质性与自我约束则使国家间利益的相互协调成为可能。而共同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则是国家间经济合作能够启动和不断深化的基础。同时,外部的条件往往也是促成国家间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②这一从欧盟的发展得出的结论同样适合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但是,没有一种合作模式是通用的,对次区域来说,我们必须结合其特殊的区情进行分析。

一、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合作意识的形成与巩固

湄公河次区域五国中,除泰国是东盟的创始国外,其余四国都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加入东盟的新成员国。因此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分析就离不开东盟的影响,对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合作基础的分析首先从它们合作意识的形成与巩固开始。在笔者看来,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合作意识的形成与巩固的过程不但是它们加入东盟、认同东盟意识的过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东盟意识向外扩展的过程。东盟意识在次区域各国形成共识也为次区域合作建立了思想基础。

(一)“东盟意识”的形成^①

“东盟意识”是东盟成功的关键。在 1976 年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东盟协调宣言》(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就敦促成员国要“大力发展一种地区认同意识(an awareness of regional identity),尽各种努力创建一个强大的东盟共同体(ASEAN Community)”。也就是说,建立一种共同的“东盟意识”基础上的共同体是东盟组织的一个明确目标。如果我们认为东盟组织是成功的话,那么在成功的各种因素中,共同的地区意识无疑是最重要的。

(二)“东盟意识”的扩展

东盟自成立之初就具有强烈的地理整体意识。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东

① 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② 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③ 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南亚国家联盟，就是要包括东南亚的所有主权国家。当“东盟意识”或者说东盟方式逐渐被成员国和外界所认可时，东盟开始了向大东盟目标的迈进。尤其是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东盟向湄公河次区域的提供了重要条件。东盟的扩展实质是“东盟意识”的扩展，是东盟新成员认可东盟方式、形成合作意识的过程。

这一过程以东盟吸收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②等新成员为标志。

东盟首先是克服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接纳越南入盟。因为在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入盟的问题上，东盟内部分歧明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认为越南等其他印支国家的入盟不需要改变其国内的政治体制。而新加坡方面则认为，印支国家要加入东盟，需要改变他们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然而这种分歧在有关柬埔寨的巴黎和平协议签署后得到了缓解，并于1995年7月将越南接纳为成员国。它的成功为后来新成员的加入树立了典范。其次是克服了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接纳柬埔寨入盟。这一进程对东盟所倡导的不干涉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第三，东盟顶住了外部干预的压力，接纳缅甸入盟。这次东盟面对的不再是内部的分歧，而带有明显的对抗外部干预的意味。至此，包括老挝的入盟，东盟基本完成了“大东盟”的梦想。这其中，东盟强烈的地理整体意识和原则的认同在东盟的扩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种意识，东盟才能够争取到单个成员无法得到的利益，而且在面对西方大国的压力时，能够采取强硬立场，维护其成员或准成员的尊严。

随着湄公河次区域四国加入东盟，东盟老成员与湄公河次区域新成员的政治两极化冲突逐渐消失，新成员也认识到只有合作才是解决安全问题以及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关键。湄公河次区域四国之所以加入东盟，利益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比如越南官方从越南的角度认为加入东盟是受到三个因素的推动，即吸引外国投资，与地区国家发展和保持友好关系，促进越南国内改革进程。

在政治上^①，东盟的扩展尤其有利于像柬埔寨、老挝这样的小国，这些小国就像之前加入东盟的文莱和新加坡一样，现在可以期望与比他们强大的邻国以平等伙伴相称。对于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来说，它们成为东盟成员国，标志着结束了他们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东盟成员资格使得华盛顿越来越难以合理解释其孤立河内的政策，也难以继续这一政策了。^②作为东盟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能够在多边机制中利用协调和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保证获得更多的重建和发展的资源。这些新成员也能够通过东盟外长扩大会议(ASEAN-PMC)约束世界主要大国，而对于像柬埔寨和老挝这样的小国，让他们自己谋求约束大国将是很困难的。同样，新成员能够在东盟地区论坛内寻求自己的安全利益，因为东盟地区论坛包括所有影响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主要角色。

^② 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① 本部分参考了阿米塔·阿查亚的观点，见《建构安全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7页。

^② 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在经济上，东盟的扩大增加了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推动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这也是集体认同的来源。如果说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表明老东盟国家与湄公河次区域政治冲突结束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大东盟内消除新老成员国的经济两极化问题。东盟新成员国在经济上都是相当落后的，和老成员差距很大。加入东盟后，湄公河次区域的新成员国不但从老成员国那里得到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且对外可以从东盟被赋予的“普惠制”中取得贸易福利。一方面东盟为了维护其整体的发展会照顾新成员国，另一方面，新成员国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后有发展经济、弥补差距的强烈愿望。在自身经济实力弱小的情况下，通过合作就很必要了。

因此，湄公河次区域五国经济合作意识在柬埔寨问题得以解决后逐渐形成。^①“东盟意识”的认同是他们合作的前提，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是他们合作的强大动力。

二、湄公河次区域五国经济合作的现实动力基础

我们现在看到的湄公河次区域，包括中国云南在内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有关各方都在努力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条进行，合作热情很高。现在的问题是，湄公河次区域到底有没有经济的互补性？因为次区域各国的资源属于待开发状态，如果这些资源开发出来形成产业，在区域各国间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在目前看来，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合作基础。它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在各国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为什么在合作的经济基础相当脆弱的情况下，次区域各方仍在极力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合作呢？也就是说，在次区域，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其他现实的原因。

（一）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属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也称印度支那半岛）地域整体意识，这种意识能使它们被东盟接受而显得相当重要。严格来说，湄公河只是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中南半岛的代称。因为对缅甸和泰国来说，对本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河流分别为伊洛瓦底江和湄南河。二是佛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同

^①根据阿米塔·阿查亚的描述，笔者认为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意识最早是泰国提出的。在当时，东盟和越南的对抗中，泰国和越南的矛盾是这一问题的核心，泰-越对抗的和解是双方国内变化促成的。这种变化最重要的是发生在越南。当越南进行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时，最初的东盟国家忽略了这种改革带来的深远意义，包括当时的泰国政府。然而，在1988年8月差猜·春哈旺总理当政后，泰国发现了这一转变所带来的潜在利益，提出“新经济管理政策”，旨在“把印度支那的战场变成市场”。通过与泰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推动印度支那的经济自由化，逐步减小越南统治的范围，增强泰国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同时，差猜又提出“黄金半岛”（Suwannaphum）理念。他们相信，泰国能够成为包括三个印度支那国家和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大陆部分的核心。这一系列走在其他东盟国家前面的政策，很明显表明泰国竭力推动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愿望。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泰国正是按这些观念来做的。^②此观点只代表笔者个人观点。因为论文的着重点和时间的问题，笔者没能就是否是这样一种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在这里，也主要是为了表明湄公河次区域各国虽经过历史上的恩怨情仇，但并未形成具有非东亚文化特质的文明。因此，在文化上，次区域是有共同基础的。

作用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佛儒文化^①。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协调地区内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奠定了基础。这种国家利益的可协调性成为次区域各国经济合作可持续进行下去的重要保障。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地域文化基础因素，这种因素可以说是次区域合作基本要素。

（二）强烈的合作愿望

强烈的合作愿望是国际经济合作得以启动和不断深化的动力和条件。而强烈的合作愿望可以来自对合作收益的强烈预期，也可以来自内外部环境的挤压。

在现有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中，强烈的合作收益预期是一个暗含的前提条件。湄公河次区域各国有强烈的合作收益预期吗？王子昌教授在对东盟经济进展缓慢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这一前提条件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社会多元化发展比较明显为假定的。而当时东盟内部缺乏合作的强烈愿望，因而经济合作进展缓慢。如此，对次区域来说，也同样缺乏收益预期。但是，如果我们将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中的合作收益预期内涵扩大，将其延伸到政治、社会、安全等其他领域，丰富合作收益预期的内容，我们发现，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对合作收益的预期十分强烈，包括为国内经济发展争取到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融入地区事务免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政治愿望、争取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和援助资金的期望等等。而且，在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第一阶段，虽然因为战乱和国内时局不稳，湄公河委员会仍然为该区域从国际社会争取到了 4.2 亿美元的资金。这一领域合作的成功所带来的外溢效应 (spillover effect)，为次区域如今的合作带来了成功的预期，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前进。

除了次区域各国强烈的收益预期外，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成就了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行。湄公河次区域五国除泰国外，国内政局不稳且战乱不息，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当战争结束后，恢复和发展经济就成为当务之急。而外部环境的影响最终转化为内部发展变化的动力。这种外部环境范围由大到小表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全球背景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多边谈判遭遇重重障碍的情况下，区域主义或者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迅速掀起，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次区域各国加入东盟，也就标志着它们卷入到了这一轮浪潮中。第二，作为东盟新成员，它们和东盟老成员的经济差距非常大，要完成已经取得共识的到 2020 年建立类似欧盟的“东盟共同体”^①目标，避免东盟分裂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东盟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支持新成员的发展，另一方面新

^① 该目标是在 2003 年 10 月 7 日，在印尼巴厘举行的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上确定的，它包括三份协议构成，即《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统称为《巴厘第二协议》。

成员国必须通过合作寻求最大收益。第三，“东盟意识”形成的特殊思考和决策方式，使得东盟国家的很多决策项目一般都是由外部组织提出的，从东盟需要加强协调和合作开始到东盟“共同工业计划方案”。之所以这样，是为了避嫌方案偏向某一个国家的利益，达到一种客观性。在湄公河次区域新成员国未加入东盟前，该区域的合作开发也是国际组织提出并实施的，其中以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最成功的一个，亚行自然也就是该区域重要的外部力量。亚行不但很好的协调了各方的利益，而且次区域项目的建设成为巩固和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

（三）泰国在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推动作用

泰国是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在柬埔寨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时，泰国就提出“将印度支那的战场变成市场”^②的政策，这一走在东盟官方立场之前的政策，受到东盟其他成员国带有疑虑的欢迎，而批评者认为这是泰国自我经济利益驱动的自私行为，损害了东盟“协商一致”的原则。其实，在东南亚大陆部分（湄公河次区域范围内），包括差猜后来独创的“黄金半岛”理念，泰国不但渴望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渴望成为框定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安全重点的领导国家。如果泰国成为东南亚中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的国家，就会与海上范围内作为政治领导者的印度尼西亚和作为金融与通讯中心的新加坡形成竞争。这才是印尼和新加坡有以上态度的根源。后来泰国政府在1993年又提出“黄金四角经济计划”，得到中国、老挝和缅甸政府的支持和呼应。以交通和发展旅游业为经济合作重点，旨在建成中国通向中南半岛的陆上通道和经济走廊。随后，虽然东盟在1996年发起形成了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但是都未对泰国在次区域的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东盟似乎在看待泰国在次区域日益上升的影响问题上有所转变。在他们看来，与其让东盟外势力去主导湄公河次区域的开发，不如让东盟内部的力量去主导好。而且，泰国始终没有放弃在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想法。直到2003年，泰国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机会。这一年的11月12日，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四国领导人在缅甸蒲甘签署《蒲甘宣言》，成立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南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Ayeyawady-Chao Phraya-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ACMECS）行动计划。2004年5月10日，越南加入该机制。鉴于泰国在次区域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五国一致同意泰国在其中发挥协调和核心作用。可见，泰国在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② 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4页。

第四节 亚洲开发银行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Asia Development Bank, ADB，以下简称“亚行”）发挥主导作用的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亚行的目标宗旨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区情决定着需要亚行发挥主导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于 1966 年，是一家致力于减少亚太地区贫困的多边发展金融机构。亚行的根本目标是消除亚太地区的贫困。其活动包括三个战略性课题：私营部门发展、区域合作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区域合作是亚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内容。亚行自成立时就提出，亚行将促进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和合作，服务于区域集体或个体发展中成员的经济增长。^①在必要的情况下，亚行将利用自身资源，通过项目贷款、技术援助等形式使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②

亚行的区域合作政策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通过相互补充的三个功能体现出来：一是作为信息的提供者；二是作为发展中成员发展的合作伙伴；三是帮助公共和私营部门资源的有效流动，为区域合作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区域合作作为“减少贫困战略”的一个核心主题正是亚行工作的重点。本文研究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就是按亚行的标准划定的。

前面已经分析了次区域的基本区情，在笔者看来，对次区域合作顺利进行产生重要作用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资金的支持；二是一个有力的合作协调组织者。亚行所具有的特殊身份正好符合要求。首先，对于次区域来说，贸易和投资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中十分重要，但是贸易和投资作用的发挥都需要资金的投入。提高贸易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这部分资金是亚行贷款和援助项目的重点。资源的开发利用也需要资金，亚行在其中发挥中介和技术援助作用，大部分靠跨国企业和私营部门的资金。在次区域各国或地区没有能力完全自己解决的情况下，亚行的贷款和援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次，为了促进次区域各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促进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很多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都是跨境的，涉及到多国多方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协调，亚行在其中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992 年开始实施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亚行开展最早的项目，也是该行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项目。亚行将在该次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的作用定义为：鼓励沿岸国之间的对话，加强互信；通过具体项目的论证、开发、支持、推动该次区域内的各项经济合作项目的开展。同时，考虑和照顾湄公河沿岸各国的利益，为各国开展区域合作起到协调、提供便利和部分融资的作用。^③

^① ADB :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ticle 1, www.adb.org.

^② ADB :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ticle 2, www.adb.org.

^③ 王勤：《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与前景》，载《南洋问题研究》，2003 年第 4 期。

由亚洲开发银行牵头举行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机构。2002年起，又确定今后3年举行一次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启动后，为保证相关的投融资计划与亚行按成员国组成董事会决定重大投融资事项的体制相衔接并讨论和决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问题，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开过13次，^①并于2002年11月3日在柬埔寨金边成功举行了首次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

第五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特征和面临的问题

一、组织特征——松散型

前面已经谈到，东盟的成立不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而是其成员在内外部安全环境受到挤压的情况下政策协调的结果，合作动力不强，决定着东盟的合作没有超出国家间合作的范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呢？有的认为它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有的认为它只是国家间的一般合作。笔者倾向于后者，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松散的、开放的国家间合作。

国家间合作就是国家间政策的相互协调，它是以各国政策独立为前提的。而一体化是指国家间把有关事务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汇聚到了一个共同体制下进行的过程。就经济的一体化看，一般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成员国之间歧视的消失；第二，维持对非成员国的歧视；第三，成员国之间在企图拥有持久的共同特征和限制经济政策工具的单边使用上有一致的结论。因此判断是国家间合作还是一体化组织，主要的依据在成员国是否把一部分国家权利赋予了共同的机制。在一体化情况下，组织的决策机构从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出发，制定适应于各成员的法律和政策；组织的执行机构由独立于各国、忠于共同体章程和利益的公务人员组成。简言之，共同的决策和独立的执行机构是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原则和政策的协调是国际合作的特征。^②

虽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某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征，如生产要素会在次区域这个地域范围内趋于自由流动，从而带来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得相应提高，表现为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是次区域对区域外的开放性，不存在维持对非成员国的歧视，而且各地区的单边开发也是

^②有关会议的简要情况请见附录III。见 www.yunnan.cn/282/2003/10/22/64@23602.htm，其中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分别由部长会议会议纪要整理。

^③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次区域合作的主要表现之一，这就决定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开放和松散的国家间合作。它是相邻国家之间的一个非正式多边合作机制，各参与国只是在现有关系基础上就基础设施、能源建设、贸易投资等一些特定领域进行自主合作，其目的是使该地区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更具规模的开放性市场。在1994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三届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次区域合作项目的参与国可以是次区域内的任何几个国家，无需一定要六个国家”，“为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设立基础不是该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合作的思想是建立和扩大现有的关系”。^①

这样，次区域各方具有完全的自主权，所有决议的形成均需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上进行磋商，亚行是在其间起协调作用。一系列的部长级会议就次区域合作形式达成的协议，主要包括项目优先权的标准、项目的先后次序、机构设置的安排等。在实际运作中，亚行十分注重合作项目实施中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效，以便使各国保持继续合作的动力。

二、面临的问题

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笔者持乐观态度。这种前景不在于能否完成对次区域合作表示关注的各方所制定的目标，而在于通过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实施的项目建设为加深本地区的经济联系和推动次区域各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从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来讲，认识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笔者将其分为战略上和现实中的两类来分析。

所谓面临的战略问题，一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不甚明朗；二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拓性跨越式发展。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亚行牵头主导的经济合作，他们认为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它们的主要任务，这些应该是亚洲各国政府的事情。但是亚行将推动亚洲共同体的形成作为其最终目标，靠支持各次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局部一体化来推动整个亚洲一体化的形成。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人和催化剂，它只能通过部长会议通过的项目实施影响合作的进程。而在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各方同意将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合作作为五个优先加强合作的领域之一，还提出实施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一次领导人会议所制定的该区域中长期全面发展规划，这表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融入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框架内。中国和东盟欲通过自身的力量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行。从长远看，这和亚行的目标并不冲突。通过东盟倡导的与中、日、韩的“10+1”、“10+3”合作机

^①王勤：《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与前景》，载《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4期。

制，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对亚洲经济一体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盟提出到 2020 年实现东盟共同体的目标，在 2004 年的东盟和中日韩峰会上，又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在 2005 年 4 月 22 日，博鳌亚洲论坛推出 2005 年度《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也就是说，建立“亚洲共同体”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现在的问题是，从局部性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到“东亚共同体”，以至于“亚洲共同体”的形成，是不是要走和欧盟一样的路，是不是要形成和欧盟组织制度一样的体系？首先，笔者认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实现“亚洲共同体”虽然困难，但是不是没有可能，关键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其次，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亚洲共同体”的组织框架可能不会和欧盟一样，它具有亚洲的特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诸国，在经历过殖民统治后，形成强烈的民族性格，国家主权意识非常强烈，要像欧洲国家那样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给共同的体制是很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东盟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在内的合作属于松散的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应该是决定两者形不成相同组织体制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影响是不是根本的？由于笔者专业所限，还有待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拓性跨越式发展主要体现在发展路径上。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属于开放的、松散的国家间合作，不属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其核心问题就不是关税和投资贸易壁垒的问题。按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程和组织形式理论，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向一体化目标迈进，要经历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六个依次递增的阶段。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就其合作的内容领域来讲，属于区域发展中的合作。这种合作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衔接、消除贫困、经济增长、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等为主要内容。这也就决定着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一个演进方向不是“特惠关税区”。其合作程度的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可扩展性上，包括“自身空间领域的直接扩展”或“通过溢出和扩散效应向区外国内腹地辐射，带动成员国内其他地区以经济的发展”两个方面。^①由此看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组织应该属于不同性质的并行经济合作形式。也就是说，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不能走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进路径。

然而，在 2002 年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框架确定后，中国明确提出将大湄公河次区域构筑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这样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实际上已纳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框架之中，标志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已经开始迈向“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之所以称其在发展路径上具有开拓性，原因正在于此。一般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建立在经济贸易

^①赵永利、鲁晓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载《国际经济合作》，2004 年第 1 期，转引者：www.cfta.org.cn，2004 年 5 月 10 日。

联系日益紧密的要求基础之上。而次区域因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区域内各国间的经贸联系和与区域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完成经济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次区域各国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在 2015 年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任务。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路径上的开拓性跨越式发展正在于在前进中去弥补基础的不足，走其他经济合作组织从未走过的路。至于这一壮举能否成功，关键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和东盟将大湄公河次区域东盟新成员的建成时间推迟到 2015 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坚定信心基础上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能走向成功。

由于次区域特殊的区情，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相当严峻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一）次区域合作面临的内外环境困难

表现在：(1)次区域整体经济实力不强，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2)国际大区域的合作，淡化了次区域合作的作用。当前，国际关注的热点集中在欧盟、东亚、东盟等的合作，而次区域发展步伐相对较慢，有被淡化之势；(3)周边国家和国家环境对次区域发展影响越来越大。次区域在发展中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优势的压力，必然会面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压力和挑战。但由于次区域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围绕合作开发，区域内国家和区域外国家、地区、国家组织纷纷以各种方式进入、多轮驱动、多种合作机制并存、国际关系复杂、竞争激烈的场面。这虽有利于市场竞争，但也会从另一方面干扰合作开发的顺利进行，增加团结协作的难度。

（二）次区域合作的基础要素落后

表现在：(1)资金匮乏，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严重制约了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领域的发展速度。从目前情况看，柬埔寨的基础设施最落后，老挝、缅甸、越南也急切要求改善基础设施。特别是次区域国家之间的联系通道还处于相邻而不相通的状态，造成人员、货物流通不畅，贸易成本高，制约了相互间经贸合作的发展；（详见表 4.6、4.7、4.8、4.9）(2)劳动力素质低，缺乏技术及管理技能，严重阻碍该区域经济的发展；(3)市场发育程度低，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经济环境。由于该区域大部分国家过去实行较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正处于转轨过程当中，市场机制不甚健全，资本等要素市场尚未形成，制约了次区域开发开放过程。

（三）次区域经贸合作基础薄弱

表现在：(1)贸易体制不完善，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信息化程度不高。次区域各国的投资环境还须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为相互的贸易与投资提供法律上的保证和制度上的便利。目前，次区域国家是以利益为纽带的非制度化运作模式，还

^①本部分参照《云南省促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五年计划》(2004-2008)的部分内容。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因此，必须使已有的合作制度化；(2)贸易发展不平衡，层次较低。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基础及产业结构不同，贸易不平衡，造成中国、泰国与其他四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四国的支付能力弱，严重制约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同时，次区域贸易和投资仍处于较低层次，产品的配套能力相对较弱，商品缺乏国家市场竞争能力，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次区域国家间的贸易保护严重影响区域经济合作进程，非关税壁垒制约了次区域产品及服务的合理流动和发展，形成时冷时热的局面。

(四) 利益协调困难

次区域的合作机制较为松散，相互间协调、咨询机制不完善，各国间的合作经常产生矛盾或不协调。目前，尚缺乏一个高效、多边、能及时解决实际问题的合作协调机制，从而加快推进次区域合作步伐和领域。由于各国的出发点、利益点、紧迫性等认识尚不一致，因而，对流域的开发在目标和重点上还存在分歧，上、下游国家在利益上也存在矛盾。

表 2.1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路及相关统计 单位：万 Km²、千米、辆

	国土 面积	总里程	油铺路	入户车辆数	货车总数	每千人拥 有车辆数	每千人拥 有货车数
柬埔寨 (2004)	18.10	35769	1996	918000	32000	68	2
老挝 (2004)	23.68	31209	4497	187000	10000	37	2
缅甸 (2001)	67.66	28790	23179	445000	53000	9	1
泰国 (2005)	51.31	51467	50151	25266000	646000	405	10
越南 (2001)	32.96	15571	11258	7621000	194000	97	2
云南 (2004)	39.4	200333 (2008)	-	4400000	323183	18	8

表 2.2 大湄公河次区域铁路及相关统计

	柬埔寨 (2005)	老挝	缅甸 (2001)	泰国 (2005)	越南 (2004)	中国云南 (2004)
国土面积 (万 Km ²)	18.10	23.68	67.66	51.31	32.96	39.4
总里程 (千米)	650	—	4759	4035	2600	1984
客运量 (千人)	81	—	61280	49671	10627	13605
客运周转量 (万人千米)	45(2000)	—	4477	9052	3426	3007
货运周转量(万吨千米)	76(1999)	—	1171	3621	2000	4634

表 2.3 大湄公河次区域航运及相关统计

	河运			海运		
	河港数	客运量	货运吞吐量	海港数	客运量	国际集装箱吞
	(个)	(百万人)	(百万吨)	(个)	(百万人)	吐量(百万吨)
柬埔寨	7	0.07	0.01	2	—	2.11
老挝	—	—	—	—	—	—
缅甸	9	0.21	1.29	9	0.003	10.36
泰国	12	4.14	19.65	15	0.32	142.54
越南	—	—	—	—	0.20	72.78
中国云南	8	3.69	1.69	—	—	—

表 2.4 大湄公河次区域民航及相关统计

	国内航运				国际航运				
	机场数	客运量	货运量	起降	机场数	客运量	货运吞吐	离港班次	到港班次
	(个)	(千人)	(千吨)	班次	(个)	(千人)	量(千吨)	(千次)	(千次)
柬埔寨 (2004)	6	192.4	0.04	5869	2	1442	21.9	7.9	5.8
老挝 (2005)	14	273.4	0.81	8425	3	160	551.3	1.4	1.4
缅甸 (2001)	21	1028.7	3	16567	2	528	11.47	3.0	3.0
泰国 (2004)	29	40352	1122	358155	5	37040	810	153.2	131.3
越南 (2005)	20	—	—	—	2	4992	93.8	—	—
中国云南	9	3666.9	59.6	45568*	1	100.928	61	—	—

“*”表示国内和国际总起降次数。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ASEAN STATISTICS 2006》，由于东盟选

取的数据来源于各国网站，数据并非是 2003 年的数据，而选取最近年份的数据。云南数据来源于《云南

统计年鉴》(2006)及相关的统计公报。

小结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可分成三个阶段，2002 年是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转折点。在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框架下分析了湄公河次区域五国的合作问题，其中重点分析了次区域五国合作意识的形成和巩固以及合作的现实动力基础。笔者认为，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合作意识的形成过程不但是它们加入东盟、认同东盟意识的过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东盟意识向外扩展的过程。东盟意识在次区域各国形成共识也就意味着次区域合作建立了

牢固的思想保证。“东盟意识”的认同是他们合作的前提，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是他们合作的强大动力。然而由于其经济发展的内在缺陷造成源自经济发展内在推动的区域合作基础薄弱，在笔者看来真正促使次区域合作开展的现实基础有：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强烈的合作愿望以及泰国在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推动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因其目标宗旨的要求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其主导作用具有其必要性。其牵头组织实施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项目是本地区最成功的项目，在本地区形成的各种合作机制中具有绝对的主导性。因此，由亚行组织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将是中国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的主要方向。

第三章、 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第一节 中国加强同东盟经济合作的动因分析

2002年11月3—5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盟和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概括起来,中国加强同东盟的经济合作是“两个环境”、“三个基础”和“两个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两个环境”

何谓“两个环境”?在这里,主要是指中国面临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就内部环境来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长达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增长9%以上的高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新奇迹。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5616亿美元,增长17.8%,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①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有力的拉动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贸往来增长很快,2006年中国对该地区贸易额达到5024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2.5%。^②而且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2007年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逆差有875亿美元,其中同东盟贸易逆差是28.3亿美元,^③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复苏所产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同时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为适应WTO规则而进行的经济结构与体制的调整,将使中国经济释放出更大的潜能,实现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巨大进口需求,将为东盟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巨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遇。这要求我们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增长和完成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和交往,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就外部环境来说,可以分为政治安全环境和经济安全环境。中国之所以在与东盟有不断增长的庞大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建设自由贸易区,从政治安全上看,是

^①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1/22/content_10700948.htm。

^②<http://news.sohu.com/20070714/n251055942.shtml>。

^③http://www.gx.xinhuanet.com/dm/2009-01/20/content_15501771.htm。

战略性的考虑，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种战略性是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决定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选择。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安全，但是，这又往往会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中国与东盟在充满变数的国际关系中，如何寻求一个固定的对话渠道，使充满变数的关系得到一定的控制，避免外部力量的卷入使问题变得复杂化，是双方要考虑的战略问题。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如何调整外交战略，在与中国交往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与中国的关系中东盟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也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使与东盟的合作效益最大化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战略问题。相互关系中的这种战略考虑，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得以顺利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战略的考虑是双方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安全成为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内容。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的地缘经济安全是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和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在全球化、多极化时代，中国要成为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组织的一员，谋求平等的地位，在处理多边关系时仍要奠基在双边的基础上。在经济合作中，中国应与周边国家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以消除周边国家因中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疑虑和恐惧。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以自由贸易区（FTA）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猛。WTO公布的数据表明，截止2007年7月，报告给WTO的区域贸易协定达380个，其中，正在实施的205余个。区域贸易协定内部的贸易总量占到全球贸易总量的2/3，其中北美和欧盟的区域内部贸易量超过了世界贸易总量的一半。^①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促进区域经济竞争力、扩大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也对区域外国家产生歧视和排挤。对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在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与世界其他贸易集团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该怎么办？“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积极参与区域性经贸组织，以使我国贸易不受区域贸易集团的排挤。”^②通过积极的经济外交，与周边地区国家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是我国维护地区经济安全的主要手段。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环。

① 刘方、张立韬：《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

② 易小准：首届中国商务发展论坛发言词，2004年11月27日，见www.cafta.org.cn，2004年11月30日。

二、“三个基础”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三个基础”指的是政治基础、经贸基础和文化基础。东盟国家是中国的友好近邻，与中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东盟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历经风风雨雨，逐渐走向成熟。至 1991 年，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5 年后中国又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 年，中国与东盟共同确立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近年来，双方合作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一）政治基础

中国与东盟本是好邻居，由于受冷战的影响，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几经周折，历经沧桑。在 20 世纪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五六十年代的对抗和不接触阶段、七十年代的松动缓和阶段、八十年代的平稳发展阶段、九十年代的顺利发展阶段，进入新的世纪双方面向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迈进，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

1991 年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后，10 多年来，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双方组织机构间的对话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为双方开展全方位合作以及扩大共识、解决局部问题上的争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深化发展同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和为双方在地区性、国际性事务中进行全面合作创造条件，在新世纪双方确定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使得双方的合作领域深入到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领域，合作的基础不断得到加强。

2003 年，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10 月 7—8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出席在印尼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在 10 月 7 日温家宝总理做的《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演讲中，对中国一贯奉行的睦邻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①的主张，并强调这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指导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基本纲领。从 1991 年起中国出席了东盟成员国外长会议和后来建立的东盟地

^① “睦邻”是指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睦邻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

区论坛,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建立正式的对话机制。2003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国家,进一步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中国愿意与东盟一道,积极落实《中国—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提出的各项措施,巩固双方业已建立的安全合作,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由于历史上的共同遭遇,双方形成了良好的历史共识,都认识到唯有保持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才能保证国内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2003年10月10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在总结双方关系近年来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东盟关系做出的新定位,标志着双方关系迈上了新台阶,成为合作的重要法制保障。

2004年第八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11月29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双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以及《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东盟在协议中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些协议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已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

(二) 经贸基础

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的良好势头为双方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双方在进出口贸易、相互投资、劳务承包等领域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中国与东盟已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1、双边贸易

过去1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了6倍多。1997年以来,双方贸易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①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双边贸易额在1998年有短暂的下降。1999年,双边贸易额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超过1997年的水平,达272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都以高于中国总体对外贸易增幅的速度在增长。200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为1059亿美元,2007年双方贸易额达到2025亿美元,三年间年均增长24.1%。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东盟已成为中国第4大贸易伙伴。2008年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达23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增幅因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其中,我出口1141.4亿美元,增长20.7%,较去年同期回落11.4个百分点;进口1169.7亿美元,增长7.9%,较去年同期回落13.1个百分点。我对东盟贸易逆差28.3亿美元,同比下降80%。在东盟国家中,马来

^①吴综之:《中国: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角色》,www.cafta.org.cn,2004年3月9日。

西亚、新加坡分别为我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①

表 3.1 中国与东盟历年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		中国对东盟的进口		贸易平衡	
	中国统计	东盟统计	中国统计	东盟统计	中国统计	东盟统计	中国统计	东盟统计
1993	106.79	88.651	46.83	43.364	59.96	45.287	- 13.13	- 1.923
1994	132.09	110.628	63.79	57.590	68.30	53.038	- 4.51	4.552
1995	203.69	133.306	104.74	71.297	98.95	62.009	- 5.79	9.288
1996	211.59	166.917	103.10	92.176	108.49	74.741	+ 5.39	17.435
1997	251.56	226.508	127.00	134.829	124.56	91.679	+ 2.44	43.15
1998	236.44	204.141	110.35	112.115	126.09	92.026	- 15.74	20.089
1999	272.02	219.225	122.75	123.317	149.27	95.908	- 26.52	27.409
2000	395.22	323.159	173.41	181.370	221.81	141.789	- 48.4	39.581
2001	416.15	319.152	183.85	173.992	232.29	145.160	- 48.44	28.832
2002	547.66	427.597	235.68	232.122	311.97	195.475	- 76.29	36.647
2003	782.6 *	552.220	309.3 *	282.229	473.3 *	269.991	-164	12.238
2004	1058.8		629.78		429.02		+200.76	
2005	1303.7		749.99		553.71		+196.28	
2006	1608.35		895.26		713.09		182.17	
2007	2025.5		941.8		1083.7		-141.9	

注：标“*”见中国贸发网 www.tdctrade.com，转引自黄定嵩：《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西南民族经济》，

2004 年版，第 35 页。

资料来源：中方统计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转引自古小松：《中国 - 东盟知识读本》，2004 年版，

第 198 页。东盟统计数据见东盟秘书处：《ASEAN STATISTICS 2004》。2004-2007 年数据见《东南亚经济

运行报告（2008）》，2008 年 10 月，第 380 页。

^②<http://news.eastday.com/c/20081029/u1a3947030.html> 和 http://www.gx.xinhuanet.com/dm/2009-01/20/content_15501771.htm。

从表 3.1 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统计手段上的差别，主要的问题在转口贸易的统计上。这不能影响双方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这些问题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表 3.2 2000—2007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单位：万美元

国别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文莱	7,437	16,540	26,283	34,626	29,900	26,086	31,494	35,876
柬埔寨	22,355	24,045	27,611	32,065	48,200	56,300	73,286	93,399
印度尼西亚	746,377	672,360	793,480	1,022,886	1,348,000	1,251,000	1,905,546	2,499,641
老挝	4,084	6,187	6,396	10,944	11,354	12,800	21,836	26,386
马来西亚	804,487	942,508	1,427,051	2,012,730	1,872,000	3,071,000	3,710,951	4,638,632
缅甸	62,126	63,154	86,164	107,974	114,000	121,000	146,007	207,784
菲律宾	314,173	356,432	525,940	939,952	1,333,000	1,756,000	2,341,270	3,061,576
新加坡	1,082,067	1,091,899	1,403,078	1,934,862	2,668,400	3,315,000	4,085,791	4,714,398
泰国	662,404	705,096	855,695	1,265,475	1,734,000	2,181,000	2,772,649	3,463,812
越南	246,641	280,857	326,427	463,945	674,000	819,000	994,943	1,511,758
合计	3,954,151	4,161,079	5,480,127	7,827,462	9,834,858	12,611,191	16,083,773	20,253,26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其中，2004、2005 年

数据为网站查阅，由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and 2006 年中国 - 东盟博览会

<http://www.gxradio.com/2006caexpo/index.asp>。

双边贸易呈现出以下特点：^①

(1) 双边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东盟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由 1975 年的 3.55% 升至 2005 年 1-11 月的 9.14%。

^①<http://www.166.cn/html/2006/01/11/3550.htm>。

(2)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双边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在双边贸易中的地位逐年提升。自 2000-2004 年间, 我国与东盟双边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额年均增幅达 42%, 占双边贸易额比重也从 2000 的 27.1% 增至 42.2%, 高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占外贸比重的 13.9 个百分点。东盟成为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我国第 3 大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伙伴、第 1 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来源地和第 1 大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逆差来源地。

(3) 双边贸易中中方持续逆差, 今年逆差略有减少。自 1993 年起, 中国对东盟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2004 年, 中方逆差达 200 亿美元。今年我国对总体进口实行宏观调控, 自东盟进口增幅放缓, 1-11 月中方逆差同比下降了 7.2%, 达 175.8 亿美元。

(4) 三资企业在双边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 三资企业进出口额占一半以上。2005 年 1-10 月, 三资企业与东盟国家贸易额为 637 亿美元, 占总额的 60.6%。东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地区之一。

2、相互投资与工程承包等劳务合作

双边相互投资不断扩大, 东盟对华投资已形成相当规模,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快速增长。截至 2008 年 6 月底, 双方累计相互投资总额已达 519 亿美元。在华直接投资居前 3 位的东盟国家分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其中新加坡对华投资累计达 300 亿美元, 占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约 70%。^①目前东盟 10 国均已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这些都预示着, 包括双边贸易在内的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将进一步全面发展, 前景更加广阔。

截至 2005 年 11 月, 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总金额 341 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227 亿美元。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是中国在东盟国家开展承包劳务合作的主要国家。其中, 新加坡已成为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第 4 大目的地和对外劳务合作第 2 大市场。^②

尽管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近年来发展较快, 但双方的经贸合作仍处于规模较小、水平较低的层次, 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随着中国加入 WTO, 实施西部大开发和“走出去”战略, 将极大地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济贸易、投资、地区经济等合作。

(三) 文化基础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 正式交流的历史已有 2000 多年。中国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本质上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其载体是华侨华人文化在东南

^①http://www.gxzf.gov.cn/gxzf_gxdm/gxdm_jckmy/jckmy_zgdm/200812/t20081205_94828.htm。

^②http://www.gov.cn/zwjw/2006-01/09/content_152455.htm。

亚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中国的儒家文化几乎走遍了所有的东南亚国家。现在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对文化的认同主要是由不同时代移居过去的华侨华人形成的。他们对东南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在创造东南亚文化成果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将中国文化糅合进去，使东南亚文化带有中华文化的成分。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出国旅游人数都呈现飞跃发展的趋势。作为近邻，双方的旅游游客数量猛增。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双方的文化沟通和交流。双方的艺术交流、商业性演出等活动不断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教育领域方面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学习对方语言的学生人数大大增加。目前，中国出现了“东南亚语言热”，而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中国汉语热”。这些文化内容的广泛交流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在文化价值上的认同，有力的支撑着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关系等领域的广泛合作。

三、“两个事件”

这里所指的“两个事件”是指对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用的事件，即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两个事件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

1997年中，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随后蔓延到韩国和日本。进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并波及俄罗斯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引发全球汇市和股市大波动和动荡。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政策帮助东南亚渡过难关。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政府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并采取措施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举措使东盟看到，应对经济全球化靠单打独斗不行，在集体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要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在危机期间，中国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附加条件的支持和援助，对东南亚摆脱金融危机起了关键作用，这与美国的袖手旁观大不一样。东盟的目光开始转向日益繁荣且负责任的中国。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起初，东盟认为中国加入WTO将对东盟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形成重要挑战。在2000年11月的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就中国入世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并评估进一步提升双方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等问题。在专家小组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入世虽然对东盟形成挑战，但是由于中国入世承诺一揽子开放市场的措施，由此形成新的机遇远远大于由此带来的挑

战，双方的合作是双赢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是可行的。东盟秘书处根据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模型推算得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 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 55.1%。同时，自贸区将使东盟 GDP 增加 0.9 个百分点，约 54 亿美元，使中国 GDP 增加 0.3 个百分点，约 22 亿美元。^①当然这只是局部静态的收益。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让东盟真正认识了中国，将目光转到了中国的话，中国的入世无疑直接决定了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道路上的现实选择。

第二节 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基础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中国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在合作的路径选择上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将合作的目标方向确定后，靠地方政府制定有力的政策措施实现目标。因此，中国在与东盟经济合作中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中国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指导原则和方向。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除了建立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基础之上外，还有次区域独有的动力基础和特征。

首先，云南与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对外经贸合作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

^① 东盟秘书处：《东盟 - 中国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报告》（英文版），第 31 页。

表 3.3 云南与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历年贸易情况

单位：万美元、%

	1998		2000		2002		2005		2006		2007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柬埔寨	52	48.6	66	-21.4	121	-52.4	324		352	8.7	990	182.1
老挝	1,444	3.8	1,926	25.8	1,655	-9.7	4144	22.7	6932	64.4	8339	20.3
缅甸	38,100	25	36,294	21.2	40,678	16.6	63000	14.6	69208	9.6	87357	26.2
泰国	2,290	-38.3	3,158	29	4,360	0.7	15000	17.0	13069	-9.5	22021	68.5
越南	5,332	14.2	10,000	40	16,266	1	32300	-4.6	50745	59.2	97167	91.5
合计	47,218	—	51,444	—	63,080	—	114768		140305	22.0	215874	53.9

资料来源：1998 - 2001 年数据来自外经贸部网站，转引自《CAFTA 建设与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2002 年数据见杨明：《云南与东盟外经贸发展的状况和特点》，载《东南亚报告（2003 / 2004）》第 311 页；2003 年数据见云南省商务厅网站“云南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数值表（2003）”；越南数据见曹大明、齐欢：《走进越南》，第 75 页。柬埔寨数据由 2004 年 138 万美元和增速 133.9% 求得。2005、2006、2007 年数据见《云南经济年鉴（2006、2007、2008 年）》。

表 3.4 2007 年云南与次区域五国的贸易在云南省和全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单位：万美

元、%

	进出口	占云南	与中国贸易	占全国	云南	全国	占全国	云南	全国	占全国
	总额	比重	总额	比重	出口额	出口额	比重	进口额	进口额	比重
柬埔寨	990	0.11	93399	1.06	990	88293	1.1	0	5107	0
老挝	8339	0.95	26386	31.6	3591	17794	20.2	4748	8592	55.3
缅甸	87357	9.95	207784	42.0	64068	169970	37.7	23289	37814	61.6
泰国	22021	2.51	3463812	0.64	15680	1197343	1.3	6341	2266469	0.28
越南	97167	11.1	1511758	6.4	77773	1189130	6.5	19394	322628	6.0
合计	215874	24.62	5303139	—		2662530	—	53772	2640610	—

资料来源：云南省商务厅网站“云南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数值表（2003）”，《中国统计年鉴》（2004）。

从表 3.3、3.4 中我们可以看出，云南与次区域的经贸合作是云南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最近几年，双边贸易的增速非常快，尤其是与越南和泰国的贸易。柬埔寨作为云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稳步推进。但是如果和全国对次区域各国的贸易情况进行对比，云南仍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上，一方面说明云南对外合作水平层次低，另一方面说明云南对次区域的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如果综合云南最近几年外商投资连续下降的情况，我们发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基础是较低层次上的经济互补性。主要包括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衔接、消除贫困、经济增长、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等。次区域经济合作重要的动因之一是利用合作方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在区域内的合理配置。由此带来的强烈的预期收益是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在较低的经济互补性基础上进行下去的保证。

其次，由亚洲开发银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已经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亚行为 15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 2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加上包括私营机构在内的其他合作伙伴的投入，迄今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已达 30 亿美元。^①交通、能源、农业、环境、人力资源开发等是项目的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对次区域的合作有“示范效应”。

此外，来自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偏好”极大地推动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合作的主体，而且政府的参与使得次区域经济合作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云南属落后地区，中央政府的支持体现在政策方面的扶持，而较少有资金等其他实质性投入。面对其他相邻省份在对东盟合作中的竞争和国内区域经济合作的“合纵连横”，云南只有从本省的区位优势出发，努力开拓对外合作的新局面，大湄公河次区域将是首选。这种由地方政府提出的政策安排使得次区域合作的成本较低，其承担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也相对较小。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予以确认或支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乐于推动次区域的经济合作，通过借助国外的力量发展自己。这种政府主导作用成为中国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

面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遇到的问题，作为参与合作的重要一方——中国云南省，应该审时度势，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从次区域整体利益出发，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实现自身经济的发展。因云南具有的独特地理位置，处在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陆地连接的交接点上，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中国政府明确把次区域合作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 5 个重点领域之一，并把次区域合作的目标定位为：把大湄公河次区域构筑成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把大湄公河次区域构筑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云南省的基本思路和重点是，通过 10—20 年的开发建设，把

① 第十二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会议纪要。

云南建成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在东盟的合作上，云南省提出“服务东盟、服务全国、发展云南”的发展之路。我们很容易从这些发展思路中发现云南最大的优势就是区位优势，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相对于湄公河五国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在次区域贸易和投资发展受制约的情况下，云南应充分发挥所具有的区位优势，通过大通道的建设，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使区位优势转化为区位竞争优势，进而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云南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 战略利益观——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观

次区域国家山水相连，交往密切，资源、产业和市场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当前都面临着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艰巨任务。经过十余年来的合作，次区域国家均认为，加强合作，有助于巩固睦邻友好关系和经济联系；有利于对这一地区丰富资源的共同开发，共同受益；有利于处理好有效开发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有助于各国加速实现发展目标。提高整个地区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是次区域国家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开发目标的利益诉求不同以及历史上的恩怨等原因，当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时，次区域的合作就面临着协调困难等问题。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将对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要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并为中国日后在次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做准备，战略利益观应该成为中国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参与观。

借鉴国际经济学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所谓战略利益观，在笔者看来是指，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以本国在资源开发与合作中对第三方所产生的影响为着眼点，通过利益的协调沟通，以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合作观。本质上讲，战略利益观就是一种合作观，是推动多边合作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合作观。在涉及多方利益的合作领域中，我们不但要重视本国在资源开发中对他国造成的影响，而且要重视双边或多边合作中，对第三方利益造成的影响。只要各方本着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以维护地区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是可以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对次区域合作来说，这里的第三方除了指代表各国国家利益的政府之外，还有非政府的民间团体以及国际援助组织等方面的力量。为什么中国要采取这样一种合作观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首先，信心和理解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亚行湄公河项目部主任 Rajat M. Nag 在和亚行首席对外关系专家 Tsukasa Maekawa 的

谈话中被问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时，他说，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各国自信心的逐渐形成，正像对共同体形成的信心一样，这种信心和相互之间的信任是次区域合作能发展到现在的因素。^①在次区域的多边合作中，我们只有多从对方的或地区共同的利益出发，在发生矛盾和争端的问题上多沟通、多理解才能推动合作的有效开展。

其次，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大背景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开始采取积极战略，全面参与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建设，并在亚洲区域国际机制的建设中承担主导者的角色。中国正在亚洲邻国中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和经济发展主发动机的新形象。^②要和平崛起，必先取信于人。欲取信于国际，必先取信于邻。中国必须立足于邻近区域，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这又要靠我们所制定战略政策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预期最大程度的一致。只有这样，它们才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它们的国际利益构成威胁，能和中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发展更广泛的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地区。从长远来看，随着温家宝总理 2005 年 4 月 11 日访问印度，中印两国确定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必将对亚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处在中印连接通道上的湄公河次区域对中国面向南亚的合作作用就显得日益重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面对次区域经济合作实施战略利益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此外，采取战略利益观也是现实的需要。当前，中国或者说云南省在次区域资源开发和合作项目建设上面临几个现实问题：一是南北经济走廊建设进程缓慢。东西经济走廊^③建设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越南辽宝靠近老挝边界由两国共同建设的出口特区已吸引了 50 多家外资企业的入驻。^④连接老挝和泰国的跨境大桥也已建成，这些极大地推动了东西经济走廊的建设。在涉及五个国家利益且历史上有过冲突的基础上，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能搁置争议，协作发展。对比南北经济走廊建设的中国和次区域四国的合作，不难发现双方在合作的态度上还有某种障碍。这种障碍说到底应该是一种信任问题。二是单方面开发合作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估计不足，如中国澜沧江的水电建设问题。由于没能及时和有效地沟通，在水电建设过程中，对下游国家的生态和正常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在 1994 年漫湾的一次性清空，短时间把水放干，又整个闸门关起来，水量大幅度变化。对中国上游的单方面行为他们觉得非常有必要达成共识，就重

① “Cooperation Pays, Conflict Doesn't”, *ADB REVIEW*, Volume 36, Number 6, December 2004.

② *Washington Post*, Nov. 15, 2003, 转引自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 - 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08 - 209 页。

③ “东西经济走廊”是指由越南岘港经顺化、辽宝，通过老挝孟品、沙湾拿吉，到泰国穆达汉、孔敬、彭士洛，最后到达缅甸毛淡棉横贯中南半岛的走廊地带。

④ *Cooperation Pays, Conflict Doesn't*, *ADB REVIEW*, Volume 36, Number 6, December 2004.

新组成了新湄公河管理委员会，现在它成了一个很强的对抗组织。^①人为的这些生态灾难给我们国家在东南亚导致了很多负面影响。既然国家把通向东南亚作为国家未来长期发展的突破口，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来讲，我们就更应该照顾到湄公河各国的利益，哪怕付出一些损失和代价，一定要取得下游各国的理解和信任。三是对第三方或民间组织的影响估计不足。应该说在次区域各国总体上讲，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形成民间利益集团的基础薄弱，其力量也相对薄弱。然而，在中国和泰国，这种第三方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比如中国的绿色环保组织对澜沧江水电建设的反对意见，还有泰国民间环保组织和佛教组织对泰北科技园区建设的反对。泰北科技工业园区是由中国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在泰国北部投资的最大的工业项目，总投资达 30 亿元人民币。各方对工业园区的建设给予很高的希望。然而，不到一年时间，项目处于停顿状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来自这两个民间团体的反对。除了立足于本地区形成的第三方力量外，在次区域还存在关注次区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其他国际援助或基金组织等。因此，笔者认为，战略利益观不但是中国参与和推动次区域合作，同时也是次区域各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石。

第四节 中国云南省的后发优势与空间区位优势分析

一、关于“后发优势”

从区域发展的相对差异性这一角度，将区域划分成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所谓“先发区域”，是指发展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发展阶段领先或超前的一类区域。所谓“后发区域”是指发展起步较迟，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阶段落后的另一类区域。^①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这种差异的存在具有其客观性。表现在：一是资源和区位禀赋具有静态不可逆性；^②二是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客观性；三是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具有时序性。^③

何为“后发优势”呢？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A. Gerschenkron)。1962 年，格申克龙探讨了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核心假说是相对的经济落后性具有积极作用，即经济上的相对落后，有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爆发性的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陆德明教授在

①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 页。

② 李克：《适度差距与系统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转引自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 页。

③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 页。

199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动因分析》一书中，初步形成了基于后发优势的“发展动力理论”框架，提出了后发国家的发展动力转化假说。他将后发优势推广到一般领域提出“后发展经济体”的概念，应该包括后发国家、后发区域、后发部门和后发企业等。这样，所谓的“后发优势”就是指后发展经济体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相对应，“先发优势”就是指先发经济体经济发展领先所产生的各种有利条件或创造的各种先机。^①

为什么后发区域具有后发优势呢？关于这个问题，格申克龙是从欧洲经济史的研究中提炼出以下的几个方面的：^②

（一）穷则思变

落后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至形成一种社会压力。格申克龙指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会产生经济发展的承诺和停滞的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激发制度创新，并促进以本地适当的替代物填补先决条件的缺乏。

（二）替代性的广泛存在

在吸收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后进国家在形成和设计工业化模式是具有可选择性和创造性。

（三）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

（四）后发国家的资源优势

后进国家自然资源为开发，劳动力成本低，这些都是工业发展的良好条件，可刺激工业发展。

一个区域要获得由区域后发优势带来的区域后发利益，必须通过技术传信和制度移植变迁驱动，而技术模仿创新和制度移植变迁又有后发利益驱动。首先，区域技术性后发利益诱导技术模仿创新。其次，区域制度性后发利益诱发制度学习和制度移植。最后，区域技术模仿创新与区域制度移植变迁互动。^③

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来说，总体上，都属于后发展经济体，整个次区域也是后发区域，因此也就具备了利用后发优势获取后发利益的可能性。前面也已经提到，次区域在走一条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没有走过开拓性发展之路。我们有理由相信，次区域通过有效发挥后发优势能取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扭转在区域或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①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②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张伟：《后发优势与贸易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③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④ 区域发展的七个研究领域为：区域分工与贸易、区位理论、经济增长机制、区域（国家）竞争优势、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区域政策等。见陆玉麒：《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二、区位和空间区位

区位理论是区域发展研究的七个领域^①之一。它探讨的问题是农业、工业或服务业的单个企业的最佳区位，即企业的区位选择理论；或者是在一个区域体系内所有区位的分布以及区位结构随时间发生的变动，即区位结构理论。这两个方面着重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属于综合区域理论。在这里所谈的区位是区位理论的基本要素，即点的区位属性。它包括两种类型或含义，一是绝对区位 (Site)，指的是一个点的经纬度位置；二是相对区位 (Situation)，指一种连接度和通达性度量。比较而言，相对区位远比绝对区位重要，其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地域分工的形成和发展与具有某种相对优势的区位因素密切相关。(2)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它的相对位置，而不仅仅是它的天赋自然条件。(3)最好的区位也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4)某一活动在某一区位的发展可以带动周围区位相关活动的发展，这是区位因素在空间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乘数效应。^②

绝对区位 (Absolute Location) 和相对区位 (Relative Location) 合称为地理区位 (Geographical Location) 或空间区位 (Spatial Location)。它是指地理现象在地理空间中发生和发展的具体位置。具体来讲，绝对区位又称数理区位，是指地理因素和现象在三维的地球表面的空间位置，可由经纬度和海拔高度加以精确的测定。相对区位是指一特定地理因素或现象在地理空间中与其他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关系和空间联系，可用空间距离、交通运输的难易度，以及经济、政治、社会联系来衡量。与绝对区位相比，相对区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常发生变化，具有比绝对区位丰富得多的经济地理内涵，因而更多的被经济地理学家接受，在这里，我们所谈的云南的空间区位优势也主要是指云南所具有的相对区位优势。

为什么云南的空间区位能成为优势呢？一方面，云南的绝对区位是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云南的相对区位为云南空间区位优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位于东经 97° 31' 至 106° 11'，北纬 21° 8' 至 29° 15' 之间，北回归线横贯南部，属低纬度内陆地区。东部与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为邻，北部与四川省相连，西北部紧依西藏自治区，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与老挝、越南毗邻，是中国陆路通向东南亚、南亚的要冲。云南的这种相对区位成为区位优势的关键是它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实施相一致。这是云南所具有的相对区位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先决条件。

云南位于中国西部东侧，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有 4060 公里的边

^①陆玉麒：《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1 页。

境线，是中国西部走向东南亚的前沿和通道。云南和中国西部与东南亚在资源、产业、人才、科技和资金等方面都具互补性。扩大云南和西部与东南亚的经济科技和人才交流与合作，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特别是对云南的发展至关重要。由于受到通道的障碍，双方的交往与合作受到严重制约，区位的优势反而视为劣势。因此，开辟西部国际大通道已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举措。这为云南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奠定了十分优越的国内环境和开发条件。

从周边和东南亚形势及国际区域环境来看，东南亚已建立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东盟——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黄金四角经济合作机制和湄公河委员会等，对建设这一地区的国际大通道早已取得了共识，云南实施建设国际大通道的建设无疑符合次区域各方的共同利益，顺应了国家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要求，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陆上通道提供了战略保证。同时，也为巩固中国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合作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经济的发展将积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发挥空间区位优势，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

三、中国云南省的“双向桥头堡”作用

云南的空间区位能成为优势，极大地增强了云南在对外经济合作中的竞争力。但是，仅仅意识到有这种优势还不行，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云南的空间区位优势表现在哪些方面，这对我们有针对性的提出政策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将云南视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抢占东盟市场的桥头堡已成为国内政府和学术界共识。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一桥头堡作用只是单向的，即只是从中国的立场看问题。如果我们用战略利益观看待这个问题，从东南亚国家的利益出发，云南基于区位优势空间的桥头堡作用就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一方面，借助云南的通道优势，中国内地的企业将云南视为占领次区域各国以及东盟其他国家市场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对次区域各国和东盟其他国家来说，它们也想利用其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通过便捷的陆上通道，尤其是在次区域基础设施形成比较完备的网络时，借助云南的桥头堡作用，打入中国内地庞大的市场。我们可以说，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而形成了相对于内外两区域的区位比较优势。

因此，双向桥头堡作用是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同时也是面向南亚合作的重要优势。要使这种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关键在建立完备的通道设施，形成发达的交通和通讯网络。这正是云南要积极努力去做的，也是云南积极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借以发展自身的重要途径。

第五节 区位比较优势转化为区位竞争优势研究

一、区位优势 and 区位优势

现在我们将区位优势由狭义上的地理区位延伸到包括经济学内容的广义区位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广义区位优势就是一定区域所具有的区域优势。对云南所具有的广义上的区位优势或者说区域优势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云南省通过发挥空间区位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区位优势，即某一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或优越地位。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技术、管理、政治、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①区位优势理论认为，每一个地区具有生产某一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或相对有利的条件，即区位优势。如果每一个地区或国家根据自身优势发展特定产品生产，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地区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地利用。我们不难发现，区位优势的思想实际上来源于国际分工理论的比较优势理论。区位优势为特定区域创造经济竞争优势创造了先决条件，也成为区域选择主导产业的重要条件。

对应区位理论的两个研究领域，对企业最优区位选择的研究形成了以邓宁（Dunning）为代表的跨国企业选择理论；对区位结构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区域产业聚集理论。但是，这两个研究领域并非各自独立，区域产业聚集的形成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已成为跨国企业区位选择考虑的重要因素。

区位优势的理论来源于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竞争优势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区位优势，是特定区位系统在特定阶段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和高效率优势的集成。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要素禀赋及资源的获取方式，是初级的区位优势；高效率优势来源于持续的创新，属于高层次区位优势，二者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区位优势是一个动态的集成系统，低成本优势和高效率优势可以在特定区位同时并存，其核心是基于集聚效应相关企业集群。集成动力体系包括：一是特定区位对所在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辐射能力，这是区位优势形成的基础；二是特定区位相关产业存量基础、资源获取成本、对资本和技术的吸纳能力，这是生成高效率优势的重要支撑和竞争优势循环升级的基础；三是特定区位创新基础，包括人力资本结构与素质、创新文化、信息质量等，这是高效率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四是特定区位对产业链的融合能力，这是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的关键。^②

^①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6页。

^② 张明之、乔蔚虹：《基于区位优势优势的产业竞争力：整合与升级》，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二、向高效率区位优势转化——中国云南省的态度取向

由于低成本优势所依赖的要素禀赋及资源获取方式是能够被替代的，且通过降低成本而取得的领先优势只是暂时和有限的，资源的稀缺导致成本上升，进而化解低成本优势；技术革新所形成的初级高效率优势也是因全球技术扩散而无法持续，只有创新所生成的高效率优势可以根本上改变区位优势格局，进而从根本上提升产业竞争力。这也就从理论上论证了由低成本优势向高效率优势转化的必要性。

云南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首先，对次区域各国来说，都属于后发经济体，都具有后发优势，而且，柬埔寨、老挝、缅甸以及越南，它们和中国云南相比，发展更为落后，也就意味着它们国内生产成本更低。因此，把云南放到整个次区域里，其具有的低成本优势就不明显了。其次，我们说低成本优势来自于要素禀赋及资源获取方式，也就是比较优势，通过国际贸易我们能获得比较利益。过去包括现在，我们太强调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和次区域几个国家的贸易中，我们有绝对的顺差。但是，面对这些国家日益拮据的外汇支付能力，贸易风险正在逐渐加大，云南该如何应对？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此外，我们强调次区域是一个大市场，有巨大的商机，实际上，这都是潜在的，需要我们去建设、去开发。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索取，势必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最后，从云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笔者不认为云南有足够的实力去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并发挥主导作用。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云南和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就拿最近的四川省，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云南都没有优势。

那么云南未来经济发展以及参与周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建立在区位优势基础上的高效率区位优势是云南最核心的竞争力。其本质是培育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和构建产业聚集区。因为在区域经中特定的产业链布局和产业集聚有助于强化区位优势：产业链布局取决于产业分工，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产业流程中的环节集中反映了该经济区位的竞争优势；集聚效应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反映，并且也是影响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云南低成本的优势向高效率的竞争优势的转变就成为云南的必由之路。

小结

中国加强同东盟的经济合作是“两个环境”、“三个基础”和“两个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在中央政府将合作的目标、方向确立后，由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措施予以执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

中国云南省的发展优势与空间区位优势，在其战略利益观的推动下，使其向区位优势竞争优势转化，促进了中国云南省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

第四章、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实现的途径研究

中国云南省面临的问题是要向高效率区位优势转化，根据上面关于区位优势理论的阐述，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区位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二是低成本的初级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区位优势转化。前者以国际贸易的形式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区域的比较利益来实现。这其中交易效率的提高成为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高层次区位优势的实现靠持续的创新，包括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对中国云南省来说，我们已不能按层次分别来实现区位优势。作为后发区域，初级竞争优势的实现和向高级竞争优势的转化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云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第一节 区位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在现实世界中，比较优势（包括传统的比较优势概念、新贸易理论所涉及的比较优势概念以及波特的竞争优势概念）仅仅表明了比较利益获得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价值实现为前提的，而产品价值要通过“市场”才能实现。这就存在一个“交易效率”的问题。在交易效率很低的情况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不一定能获得比较利益。也就是说，比较利益的获得还需要一个关键条件，即要有一定的交易效率与之配合。^①因此，市场交易效率也成为比较优势向现实的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因素。

交易成本的概念是科斯（R. H. Coase）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引入并阐述的。本文中的交易成本是指交易活动的参与者为实现交易而发生的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合同履行成本、交易风险成本组成，包括交易过程中的货币支出，也包括时间、精力等的耗费。在进行贸易时，交易主体在付出交易成本的同时，也获得了交易盈余。交易盈余是指通过交易达到某种“双赢”状态。从宏观层次上讲，此类两两交易的“总和”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因此，交易效率可定义为交易盈余与交易成本的比较。交易成本不变，交易盈余增加；或交易盈余给定，交易成本减少；或交易成本减少同时交易盈余增加都可提高交易效率。

国际贸易一般是国际间货物和服务的交换，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交易

^① 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 理论与实证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9页。

成本常常高于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第一，由于各贸易国的文化、商业法律、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差别很大，因此相应的信息障碍较多，成本就高。第二，由于国际贸易货物运输里程一般超过国内贸易（边境贸易除外），因而使国际贸易中的交通运输费用、保险、通讯等费用引起的交易成本高于国内贸易。第三，由于各国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所引起的高于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第四，由于买卖双方对交易商品品质的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交易成本。第五，国际贸易的风险较国内贸易的风险大。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贸易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的原因。

这样，在交易盈余一定的条件下，交易成本的变化，即交易效率的变化，对交易主体的行为会产生影响，直接影响国际贸易量的变化。在关税壁垒的总体水平有所降低的情况下，近年来，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效率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单位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电子商务的发展部分降低了信息搜寻费用和通讯费用。此外，国际贸易规模扩大导致经济主体的重复博弈，也降低了交易风险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而且，交易效率的提高也影响着国际贸易方式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变化。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企业可以通过内生交易成本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提高企业的竞争效率。在国际市场上，经济主体能否获得比较优势取决于基于产品复合生产成本比较优势和基于交易效率比较优势所带来的综合成本优势。因此，在关注经济主体获得比较优势的动力培养和能力提高的同时，若不关注交易效率的改善，经济主体同样也难以获得比较优势。

一般来说，交易效率越高，意味着经济主体获得的交易盈余就越多，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①

(1)国际层面：不断强化的国际经济规则有利于交易效率的提高；

(2)国家层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有利于交易效率的提高；

(3)中观层面：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交易效率的提高；

(4)微观层面：有利于企业提高交易效率的途径主要有：其一，企业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可以提高交易效率；其二，企业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可以减低交易效率；其三，推行外贸代理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

^①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 理论与实证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81 - 88页。

一、提高交易效率的基础和条件

在前面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中已经阐明，次区域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巩固和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云南要充分利用亚行对次区域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的机会，在制定云南的交通规划时，注重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加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开展次区域合作的前提，无论是构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前沿，还是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通”是首要条件，一通百通，交通必然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要求各个国家的商品生产冲破地方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局限性，纳入区域市场的商品经济循环中。这种经济循环运动的速度和地区经济合作的扩大，其决定因素之一的就是交通运输条件，没有便捷的交通运输，地区经济合作难以实现。在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上，笔者认为：一是一定要千方百计的适当超前规划和建设；二是一要和次区域总体规划积极对接；三是一要和国内其他相邻省份的交通建设对接，扩充和提高与周边相邻省份的交通运输能力，扩大腹地的范围。

交通联网是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对次区域经济贸易来说，交通运输成本是影响交易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云南要发挥独特的大通道优势，必须加强铁路、公路、水路以及空港的建设。一是发展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间开展水路联运，比双方绕道沿海可缩短运距 3000 多公里，运费降低 60%，运转时间可缩短一半以上。^①二是建设昆曼公路、滇越公路、滇缅公路等。这些公路是亚洲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各国经济合作交流的重要通道。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与周边国家联合实现境外公路的高等级化，形成次区域高等级的公路交通网络。三是泛亚铁路。其建设构想由“一线”、“三环”组成：一线即新加坡至昆明；三环由两小环和一大环：由曼谷、金边、西贡、河内、昆明、万象、曼谷组成的东海岸环线；曼谷、毛淡棉、腊戍、大理、昆明、万象、曼谷组成的西内陆环线，构成两小环；曼谷、金边、东海岸线、昆明、西内陆线、曼谷构成一大环。

同时加强与之相关的软件建设，实现交通的联网，促进人员、商品货物的便捷流通。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是软件建设的重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人员出入境便利化，包括统一和规范人员出入境手续、简化出入境程序、采取一致的出入境安检方式和通关报关条文；二是交通运输便利化，如统一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费种及费收、签订次区域五国的汽车运输协定和

^① 贺圣达、王学鸿、宫占奎等：《CAFTA 建设与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版，第 405 页

货物多国跨境运输协定等；三是资金流动和结算方式便利化，探索建立美元和人民币双重中心的“次区域五国货币结算体系”，为今后建立统一的亚洲货币单位（亚元）打下一定的基础；四是投资环境优化，包括次区域各国的交通、能源、通讯、卫生、安全、服务水平和政策措施等。^①

按照云南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服务东盟、服务中国、发展云南”的总体思路，云南作为中国面向东南亚的陆域通道、经贸合作前沿和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充分发挥沟通两大市场、服务两大市场的作用，积极建设交通、贸易、产业、生态、友好“五大通道”，以及信息、贸易、金融、人力资源开发和公共事务“五大平台”，逐步形成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物流、交易、服务、生产、投资五大中心，带动云南相关产业、经济带乃至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②

当前，要加强以昆明为中心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信息平台，发展云南信息产业；构筑贸易平台，打造会展、物流新兴产业；建设中国面向东盟的金融服务中心；构建人力资源开发平台，加强科技、教育合作；建设公共事务平台和友好通道等等。这些目标方向，总的来说都是围绕着如何发挥云南的空间区位优势做文章。通过硬件和软件的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使云南作为大通道的交易效率显著提高，实现云南的区位优势。

二、打破地区封锁，发展国内区际贸易

从理论上^③讲，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内区际贸易的发展对本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创造，进而改善贸易条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区际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市场范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就国内需求水平构成来说，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在生产上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产品，那些国内需求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将因为拥有相对的成本优势而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那些国内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将会因此促使厂商采取新技术，更快地更新设备，从而使其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并且这种由国内需求规模形成的比较优势将会通过国际贸易而得到加强。国内区际贸易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够生成国内市场的竞争性，从而在国内需求相对大、买者之间的竞争与效仿动态效应强烈的产品类别上建立起比较优势，并使企业在真正面临进口产品竞争以及国际市场之前能够得到必要的锤炼。

^①卢蒲、贺友华、汤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域探讨》，载《经济问题探索》，2004年第1期。

^②贺圣达：《21世纪初云南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③这里的理论不但是指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还指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由国家贸易发展而来的阐述。

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区际交易效率较低，区际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区际贸易的不发达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制约产品市场的扩大、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抑制比较优势的发挥、创造，恶化静实物贸易条件，交易效率也难以得到改进，从而影响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这种现象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专家称之为“行政区经济”，即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①因此，努力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提高区际交易效率，推动区际贸易的发展，建立统一开发的市场体系，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改善本国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重要“潜力”因素之一。在今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要突破行政区经济运行格局，首先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整合，包括政府制度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以及市场体系的培育。

我国“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已成为今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建立地方政府行为的硬约束机制，是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发展区际贸易，提高区际交易效率的重要途径，对增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②

（一）法律约束

就是通过健全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在我国，造成地区垄断或市场垄断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不良经济行为，但却没有相应的和有效的法律约束。可以说，这是我国地区封锁行为屡禁不止、一再发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尽快制定出若干针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有关法律法规，诸如反地区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是建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硬约束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风险约束

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一般来说不必承担因决策一旦发生失误而可能带来的风险成本。这是因为，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作为中观决策者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公司、大企业机构的决策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必须对企业的生死存亡负责，其职业前途好坏总离不开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而前者既不必负担经济上的盈亏责任，其个人的升降奖惩和机构的得失进退也不必依靠市场法则决定，这是助长地方政府社会博弈心理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一旦有了社会博弈心理，那么无论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还是在处理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时，博弈行为在所难免。因此，在当前体制转轨时期，必须构筑一种有效的风险

^①舒庆、周克瑜：《从封闭走向开放 - 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页。

^②舒庆、周克瑜：《从封闭走向开放 - 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65页。

约束机制，来克服地方政府因风险约束不力而可能采取的博弈行为倾向。

（三）组织约束

就是运用组织手段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加以约束。组织约束的意义在于它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往往带有一定的组织原则性，并隐含着一定的政治意义，因而是一种硬约束。因此，通过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就能起到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组织约束效果。“绿色 GDP”考核指标体系无疑是一套科学、合理、规范的考核指标体系，它避免了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数量指标的倾向。

在这些约束框架内，云南省要积极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途径，有力地推动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一方面，云南省要充分发挥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主体的特殊身份，利用国家赋予云南“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在对外经济合作的具体实践中发现和总结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政策措施，争取得到国家的支持，使之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推动国内区际间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云南省内各地区也要打破地区封锁，为产品的流动和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创造条件。着眼于国内和周边国家两个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在提高和扩大国内贸易市场交易效率的同时，云南省要站在战略利益观的视角，积极发展与次区域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动次区域各国国内的市场建设，实现云南市场和次区域市场的对接以及次区域市场和中国与东盟市场的对接，加速实现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以及次区域的跨越式发展。

三、“走出去”——企业提高交易效率的有效途径

“走出去”是指作为市场经济活动微观主体的企业的跨国投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注重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比东南亚国家对外投资的经验和邓宁以人均 GDP 为标准对一国投资发展周期的划分标准^①，中国正在向对外投资的发展期迈进。虽然中国现在正处于吸引外商投资的高峰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不需要对外投资。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理论，随着发展中国

^① 以人均 GDP 为标准，邓宁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出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 GDP 在 400 美元，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缺乏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经济实力向国外输出直接投资，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国外也只有少量资金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 GDP 在 400 - 1500 美元之间，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十分有限；第三阶段，人均 GDP 在 2000 - 4750 美元之间，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 GDP 在 4750 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属发达国家，他们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经济实力，净对外投资成正数增长。

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投资流量的增长,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论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要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某一产业或技术具有比较优势,就会产生小规模的技术优势^②,而有对外投资的意愿。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依赖于企业所在国和投资目的地的区位优势的综合分析。

企业跨国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外部交易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不仅可以使企业能充分发挥其原有的比较优势,而且还可以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由此强化其获得较多比较利益的能力。因此,企业的跨国投资是企业提高交易效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企业跨国投资是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形式,其对外投资行为的模式是由其自身“拥有特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特定优势(Internaliz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和“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所决定^③。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中,泰国是次区域对外投资的主体,也是次区域中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都比较弱。整个次区域各国都面临着吸引外部资金的问题,这是次区域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因此,中国(云南)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宜采取贸易与投资相结合的投资先导模式。这是因为,(1)建立在资源优势基础上的云南支柱产业已初步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2)云南独特地理区位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为云南向次区域对外投资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3)这也是云南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然。因为在与次区域欠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中,云南获得大量顺差,贸易的风险逐渐加大。要改变这种状况,云南要站在战略利益的高度,通过投资替代贸易的战略,开发次区域落后国家的资源,帮助这些国家逐步建立工业基础,发展当地经济。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云南与次区域各国更紧密经济关系的建立。

首先以贸易带动投资。云南有实力的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在输出技术、品牌、管理和零部件到国外办厂之前,可以先通过贸易方式直接进入目的地市场,通过贸易带动投资。其次以贸易创造投资。云南企业在边境贸易中保持着大量顺差,这种顺差可能使对方减少商品进口,也可能使对方作为债务积欠下来,无论哪种情况对云南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都会造成损害。我们要设法将这种顺差转化为一种长期投资。通过外汇债务以换取邻国企业股权和房地产权,既能消除对方支付

② 江小涓等:《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III》,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23页。

① 张小蒂:《国际投资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转引自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践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80页。

② 贺圣达、王学鸿、宫占奎等:《CAFTA建设与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410页。

能力的困难，又能以资本渗透、市场渗透的形式在国外市场立足。第三，以投资创造贸易。云南省的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中常常遇到对方缺乏支付能力而愿意采取贸易补偿的形式来支付工程款等情况。这种贸易补偿是一种双赢的形式，既能带动对方的贸易出口，扩大双方的贸易总额，还能带动云南的施工机械、成套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①

根据次区域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现有对外投资的基础，笔者以为，对云南来讲，可以形成“次区域投资循环圈”。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由于产业间的相互关联性以及产业内上下游之间产业供应链的不同，各个国家形成了对不同层次产业投资的需求结构。一般来说，泰国是次区域其他国家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次区域各国形成了三个工业化层次：泰国属工业化较发达经济体，中国云南和越南属工业化的初期，处于经济结构转轨的关键时期，柬埔寨、老挝、缅甸还处于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这样，就为次区域投资循环圈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泰国的消费需求层次相对较高，显然泰国不会将对机床加工、建材、化肥等的投资放在处在第三层次的老柬缅三国，因为他们虽然劳动成本很低，但是毫无工业基础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总的成本算下来，仍不具有价格优势。因此，处在第二层次上的云南成为泰国投资的目的地。借助泰国的外资，云南的一些产业得以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成长，由此形成对能源、原材料以及对廉价劳动力等多方面的低成本需求。而老柬缅三国的自然资源目前处于待开发状态，云南利用其丰富的原材料加工经验和设备可以投资老柬缅，包括越南四国。云南对四国的投资，可以是寻求资源开发型的，也可以是开发国外市场型的。既可以输入原料国内加工再出口，也可以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东道国生产销售和向泰国等第三国销售。完成商品和投资的循环流动，并由此带来各种溢出效应，不但使次区域各国总体福利增加，也使次区域各国经济合作更加紧密。

就合作的领域，云南应与湄公河流域各国开展农林、矿业、能源和工业四大领域的合作。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各国提供了有利于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利用和配置资源的机会，同时也加剧了各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市场和资源的竞争，云南应主动参与境外战略性资源开发，获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资源应是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选择。

根据商务部、外交部 2004 年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②的内容，中国对次区域各国可投资的产业部分见表 6.1：

^①商务部、外交部：《关于发布〈对外投资产业导向目录〉的通知》，2004 年 7 月 8 日。

具体到云南省，在现有的一些优势产业或支柱产业中，生物制药、花卉等产业尚处于创新阶段，尚无必要和能力对外投资；烟草、矿产加工、冶金、机械设备制造等产业，已处于成熟阶段或标准化阶段，而且其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因此有必要向国外投资进行转移。另一方面次区域矿产资源丰富，但采、选、冶加工设备和技術則严重不足，对云南省的这些产业也有较大需求。近期内选择贸易和旅游为先导，借助贸易、旅游企业捅开流通和消费环节，扩张商品市场，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密切次区域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形成新的市场活力，疏通各国间经济技术合作的渠道，加速次区域合作的全面展开。

表 6.1 中国对次区域五国投资产业导向目录

国别	农、林、牧、 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
柬埔寨	森林开发； 谷物种植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拖拉机、柴油机的制造； 烟草制品业；摩托车、自行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及 零部件制造	建筑；旅 游	
老挝	森林开发； 谷物种植	钾盐矿	发电机等电气机械制造；电动工具制造；摩托车 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造纸及纸制品制造；农副 食品加工		电力的 生产和 供应
缅甸	森林开发； 谷物种植； 渔业捕捞	石油、天 然气；钨、 镍、铜矿； 宝石	农业机械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汽车、摩 托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造纸及纸制 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木材加工及竹藤制 品	建筑	
泰国	薯类种植； 森林开发	钾盐矿、 钨矿、铋 矿	纺织业；电动机、空调器、冰箱等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农业机械制造；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造纸及纸制品；橡胶制品制造	贸易、分 销；建 筑；旅游	

越南	茶叶种植；	铝土矿、	发电机、空调器、冰箱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贸易、分	电力的生
	水产养殖	煤炭、铁	汽车、摩托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及零部件制造；水	销；建	产和供
		矿、铬矿	泥等建筑材料的制造；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筑；旅游	应，铁路
			制造；造纸及纸制品；饲料加工；食品加工		通讯网络
					和信号改
					造

值得注意的是，区位的选择对企业跨国经营成功至关重要，它取决于企业的投资动机、企业准备投资的领域和企业规模等。云南企业“走出去”，一定要从自身所具有的区位竞争优势出发，以上处于未开发状态的湄公河次区域四国为主要的投资对象国，获取长远的比较优势。对云南企业的投资动机，要将获取廉价的劳动力、稀缺的天然资源、规避贸易壁垒和占领市场等动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寻找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动机的区位。云南企业要以投资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重视所在国的区位资源状况。一般来说，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在区位选择上有较多的灵活性。在次区域的投资中，云南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小型企业轻工业、商品流通与贸易、旅游餐饮等服务领域对外投资的灵活性和潜力。而且，亚行以及次区域各方对鼓励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贸易与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早已形成共识。云南省可以充分利用亚行在此类项目上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扩大企业投资范围，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实现云南区位优势。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方面应当提供政策性指导，这有助于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位选择的盲目性，更好的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既定目标。因此，在云南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服务角色功能不容忽视。其关键是要培育高效的中间组织和信息服务机构，发挥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包括：为企业提供有关境内外投资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为企业提供投资地区环境、税收、法规等咨询服务；代办有关投资手续，使企业少走弯路；为企业提供学术研究与交流、培训等方面的服务等。

第二节 初级区位优势向高级竞争优势的转化

多数学者提及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其实是低成本主导的比较优势，其中被提及的最多的是低劳动成本优势。然而仅仅依赖于要素禀赋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是无法获得持续的产业竞争优势的。前面也已经提到，云南的劳动成本优势

和次区域的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来比，已经被弱化了。低成本劳动力有助于实施成本领先性战略，但是过于注重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将极大损害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效率，最终损害我国绝大部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对云南这一后发区域来说，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竞争优势升级是提高产业国内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内容。

高层次区位优势的实现要靠持续的创新。这种持续的创新从何而来？笔者以为，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是形成持续创新因素的重要来源。区位优势理论认为，特定区域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及相关产业集群构成区位优势的核心。产业集聚的发生均与某种形式的集聚经济有关。马歇尔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归结于企业为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韦伯认为，如果企业从产业集聚中得到的好处大于它们因从分散布局地迁往集中地而引起的运输和劳动费用增加，集聚就会发生；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的，当贸易成本在中等水平时，集聚通过规模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归结起来，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较低的运输成本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命脉，缺少任一方面，产业集聚就不会自我发生、自我增强而持续下去。

产业集聚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形成、快速集聚、稳定发展和衰退四个阶段。区域产业结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形成产业集聚的阶段成为形成阶段；在集聚机制的作用下，有一个快速集聚阶段，然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产业集聚发生衰退，集聚效益遭到破坏以后，成为衰退阶段。各阶段基本特点可归纳如表 6.2 所示：

表 6.2 产业集聚演变过程^①

阶段	主要影响因素	特点
形成阶段	创新时机、产业特征、区域环境、偶然因素、政府的支持	产业结构出现某一突出产业,并且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快速集聚阶段	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外部效益等	增长速度快,区域出现明显的极化效应,区域内企业数量和产品数量快速增加,获取大部分新增市场,并蚕食其他企业市场份额
稳定发展阶段	良好的区位条件、信息优势等、网络结构、区域创新系统	成为该产业的主要生产区,具有系统性特征的企业群,具有区域品牌相应,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产品具有低成本、多品种优势,覆盖面广,创新系统高效,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较快的技术扩散速度
衰退阶段	集聚机制遭到破坏,核心产业发生衰退或其他产业集聚区竞争等	企业破产、退出或减员,形成失业的浪潮,创新速度减慢,经济萧条

一般来说,高新技术园区是典型的高效率竞争优势集聚区。但是,不可能云南的所有地州市都设立高新区,这既不符合云南的现实,也不符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云南以什么为载体来发挥产业的集聚优势呢?我们知道,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以特定的地域为载体而形成特定的经济区,产业组织活动也不例外。通过政府的扶持和宏观调控,构建产业的空间集聚结构是云南向高效率竞争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对云南省来说,产业集聚区或集聚带的形成不仅要符合云南产业发展规划,对接中国东部、中部市场,更重要的是要有力地对接与次区域各国、东盟各国,以及南亚的经济合作。云南的关键是要争取亚行的贷款和国家的支持,建设好“三大经济走廊”。

^① 刘斌:《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50页

一、高级区位优势实现的空间架构

所谓经济走廊指的是以空间上相对接近的大城市为依托，以铁路、公路、航空、航运线为纽带，以沿线中小城市为接入点，以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基础，开展贸易、投资和工业、农业、旅游、交通、服务等产业的合作，建立沿交通沿线为辐射的优势产业群、城镇体系、口岸体系以及边境经济合作区，实现各种资源和生产力要素的跨区域或跨国流动，以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分工、共同发展的国内和国际经济走廊。^①

在云南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由于生态环境和历史积淀的原因，云南只能以陆路运输通道为轴，构建符合云南实际情况的产业集聚形态。亚行提出的三条“南北经济走廊”为云南实现自身区位优势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对云南来说，这三条经济走廊的建设可以形成与次区域其他国家完备的交通联系网，从而降低商品贸易运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更重要的是，运输走廊建设为产业聚集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建立在各地资源禀赋条件上形成的产业聚集区相互联系和竞争，为云南面向国际市场的优势产业群的形成奠定基础。中心城市增长点、产业聚集区以及连接的运输轴线构成了云南外向型产业发展布局结构。

三条经济走廊是 1998 年 9 月在马尼拉由亚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部长会议上提出的。2002 年 11 月 3 日，经大湄公河次区域首次领导人会议批准形成三条经济走廊即“三纵”的建设（南北经济走廊）：“一是昆明—瑞丽—曼德勒—仰光经济走廊；二是昆明—河口—河内—海防经济走廊；三是昆明—景洪—会晒—曼谷经济走廊”，三条经济走廊的目标是建成以昆明、仰光、河内、曼谷为依托，以交通沿线重要城市为重点，以边境口岸为对节点，通过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管道和信息连接而成的优势互补、联动开发的三个跨国经济走廊。同时提出的还有“二横”的建设，即“缅甸毛淡棉—泰国彭世洛—老挝沙湾拿吉—越南岷港”和“仰光—曼谷—金边—胡志明市”的东西经济走廊。

三大南北经济走廊建设将次区域薄弱的交通运输建设和产业布局建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激发了次区域各国推动经济合作的热情。对云南来说，三大南北经济走廊都以昆明为起始点，分别形成了瑞丽（昆仰走廊）、景洪（昆曼走廊）、河口（昆河走廊）三个重要的边境中心城市，以昆明连接这三个城市的交通为轴线便形成了云南面向次区域的外向型产业布局结构。显然，昆明的发展建设就成为三条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一环。

加快新昆明城市建设步伐，提高昆明的城市首位度，增强昆明在带动云南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把昆明建设成我国面向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

^①洪昆辉：《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与三条经济走廊》，载《中国软科学》，2004 年第 10 期。

其核心功能就是服务于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长远来看，也为服务和南亚的合作做准备。在《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①附件4 第六条第五款第4点提出的“通过未来设定的特定程序与机制，指定东盟成员国与中国的联络点，作为推动与促进各缔约方之间贸易与投资发展的中心”，这正是昆明努力的方向。明确昆明作为面向东南亚服务中心的方向后，根据昆明现有的基础设施和15—20年后的建设目标，我们要把昆明建设成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区域性国际商贸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会展中心和教育、科技、文化合作和交流中心。当前，昆明要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二次领导人会议的召开做好服务工作，并以此为契机，探索服务性中心城市的发展之路，以求在与周边省份的博弈中抢占先机。以昆明为中心，带动曲靖、玉溪、楚雄等城市的崛起，形成滇中经济圈，为三条经济走廊的建设做好辐射带动的准备。

三条经济走廊产业布局的构建要结合云南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确定云南与东盟各国产业合作的重点，实现云南与东盟特别是与次区域各国产业开展的跨区域、跨国合作，推进云南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加强以昆明为中心的产业核心聚集区发展的同时，逐步向沿线、沿边地区转移，以众多小城镇为纽带，以沿线大中城市为支撑点，以众多小城镇为网络，构筑昆河、昆曼、昆仰三大经济轴线。

首先，抓住泛亚铁路建设和昆明—河内—海防经济走廊建设的有利时机，形成以河口和个旧、开远、蒙自城市群为主，面向越南市场的产业带。红河州在建设昆河走廊中和其他地区有相对明显的区位优势。红河州工业基础雄厚并已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冶金、化工、机械、建材、电力、煤炭、制糖、酿酒、卷烟、制药等35个门类的工业体系。玉溪市是云南省最发达的地区，其烟草产业是云南的财政支柱。在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各个地区和城市要着眼于越南与东南亚和国际市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烟草业、有色金属和化工产业、矿产业、能源工业、生物资源开发、药产业、花卉及优质高效农业和旅游业等支柱产业，提高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特色产业成为云南经济新的增长点。

其次，积极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充分利用昆曼高速公路这条经济纽带，形成以思茅、景洪和勐腊为主的面向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市场的产业带。昆曼经济走廊是市场潜力最大的项目。因为泰国是次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实现云南市场与湄公河次区域和东盟市场的对接最主要的国家是泰国。昆曼经济走廊的建设将为泰国和云南的贸易投资合作提供较多的商机。当前，云南和泰国的合作应以旅游合作为先导，建设昆曼黄金旅游线，吸引泰国在旅游、

① 《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全文见附录VII

餐饮、娱乐服务等领域上的投资。鉴于中药在泰国的广阔市场，云南省应加强生物医药资源的开发研制，利用云南“植物王国”的优势，开发治病类、保健类和美容类中成药的生产，开发泰国市场。

最后，加快中国通向缅甸和南亚的通道建设，以大理、保山、德宏为主形成进入缅甸和南亚各国的产业带。缅甸是云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建设昆仰经济走廊建设对云南和缅甸经济合作的意义深远，而且，南亚市场是一个能和中国匹敌的潜在大市场。云南要建设面向缅甸市场的农用机械、木材加工、珠宝销售服务、日用品和建筑材料等行业，充分发挥中缅边境贸易在昆仰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昆仰经济走廊建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大通道建设进度，目前，缅甸方面的公路建设还没有落实，但可以预见，若干年后国际大通道建成将对云南与缅甸的经济、贸易、投资、旅游等合作提供最基础的条件。

三大经济主轴线的主要任务在于沟通中国与东盟尤其是云南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经济往来，在开放型的交通网络的基础上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网络，进而实现次区域经济区的建设。云南应积极发挥比较优势，把次区域三条运输走廊建成国际贸易走廊、外向型工业走廊和国际旅游走廊“三位一体”的经济走廊。

二、吸引投资—中国云南省高效率区位优势实现的重要环节

三条经济走廊的构建为云南面向次区域以及东南亚市场的产业集聚区的形成提供了框架，通过什么方式有效地建设这三条外向型的产业集聚区，实现高效率的区位优势呢？笔者以为，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导向可以快捷地完成三条经济走廊的建设。投资政策核心是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制定优惠完善的吸引投资政策。这里所指的投资，既包括外国投资，省外投资等，更重要的是鼓励私营企业、组织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投资。在这里我们将外国投资和外生投资统称为外资，赋予它更多的内涵。之所以不局限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因为在云南的国外投资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国际组织的投资项目，它们通过直接投资或招标的方式在云南进行项目建设，故这里统称外国投资。

首先，外部投资的进入可以是云南的潜在比较优势显性化。它们为云南提供了所缺的生产要素，如技能、技术、资本品和中间投入等，可以使云南充分发挥静态比较优势。一方面利用了云南闲置的静态比较优势。因为对云南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比较优势并未自动地发挥出来，所具有的天然要素禀赋和廉价的劳动力只代表着一种潜在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需要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条件。作为后发区域，可以借助于外部力量，即利用外部的投资来实现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在云南现有被发挥出来的比较优势中，有些优势利用的效率低下，通过外部资金技术等的介入，可以提高其利用效率，从而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

其次，外部投资的利用能创造出动态的比较优势。因为外部投资是资本存量、知识和技术的综合体，这些内容在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是最容易产生扩散和外溢效应的。它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条件、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机构与竞争等因素来作用于云南区位优势的实现。对云南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起关键作用的一点是，通过吸引外部投资为云南带来了稀缺的资源，帮助云南将内向型产业转变为出口导向型、有区际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实现云南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吸引外资涉及两方：投资方和引资方。在双方的博弈中，寻求利益的结合点。在这里，我们主要谈作为引资方的云南省如何吸引外国投资和外省投资的问题。

在影响投资方区位的选择中，引资方的投资环境是重要的内容。实质上，区位就是投资环境。对于影响双赢的投资环境因素分析，按照因素的最突出功能和作用，归结为三类因子共 11 个因素。三类因子是指：基础型因子、激励性因子、创新性因子；11 个因素是指：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法规、劳动力及其因素、社会因素、政策因素、金融因素、科技因素、生态因素等。^①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各因素组合的影响力不同。对外商投资影响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由三个方面：(1)引资方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性以及经营便利性措施；(2)引资方的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包括有效率的基础设施、引资方的市场规模与劳动力成本；(3)引资方吸引外资的政策框架和规制政策。如果我们将吸引外省投资的投资环境因素考虑进来，可以简单概括为“3I”：激励性因素（Incentives）、制度性因素（Institution）、基础设施因素（Infrastructure）等。这里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是指当地政府吸引外部投资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等。

对云南投资环境的评价和优化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研究^②，但是这些研究将云南看成是一个封闭的区域，静态地对其投资环境进行了空间归类，存在着一些不足。从产业中观层次来看，云南吸引外商和外省的投资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③的精神，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培

①付晓东、胡铁成：《区域融资与投资环境评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11 月版，第 220 页。

②唐邦勤：《云南省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与优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2000 级硕士论文，2003 年 6 月。

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 年 7 月 29 日，www.sdpc.gov.cn。

育规范的投资中介服务组织，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公平竞争；健全投资宏观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完善调控手段；加快投资领域的立法进程；加强投资监管，维护规范的投资和建设市场秩序。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最终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

其次，树立区域营销的观念，紧紧抓住云南独特空间区位形成的“双向桥头堡”作用，吸引外部投资。所谓区域营销是指，区域从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出发来塑造投资环境，并把整个投资环境像产品一样对外推销，来吸引投资者投资的一系列与投资市场有关的活动的总称。^①对于云南来说，由于自身市场容量有限，对那种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企业来说吸引力不大。云南的真正优势就是空间区位优势。“双向桥头堡”的大通道优势是云南值得做的文章。对省外企业来说，在云南投资一方面可以直接出口次区域市场，而且还可俯瞰南亚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云南也是它们进一步直接投资东南亚市场的信息中转站。对于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者来说，抢占云南市场，投资云南产业，对进一步投资中国内地市场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要将云南具有优势的产业项目通过全新的营销手段推向国内外市场，以项目投资带动产业发展。

第三，及时修订吸引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对省外投资应该开放所有国家法规禁止开放的产业，最大限度的扩大利用外省投资的范围。对于外国投资，云南省政府部门应根据国家《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4年修订）》^②的内容，根据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尽快出台最新的云南省的指导目录。而且，应该根据经济发展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实际进程实时调整。

第四，在吸引外部投资的产业布局上，优先考虑有利于三大经济走廊建设的外部投资项目。应该说企业的投资行为是自主的市场行为，产业集聚的形成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但是，由于企业的逐利特性，市场的自主行为往往背离社会发展的道德方向。为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调控作用。一是在企业投资具体区位选择上的干预，二是在企业投资项目产业类别上的干预。在次区域的经济合作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已成为各国吸引外商投资重要的考虑因素。

除了外国投资和外省投资外，如果从投资来源的性质上分可以将投资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和西部大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政府投资仍是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一些交通运输、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仍是以政府

^①王定一：《区域营销 - 招商引资新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9页。

^②商务部：《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4年修订）》，2004年8月3日，www.mofcom.gov.cn。

投资为主。因为政府投资是对政府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落实，所以在这里所谈的吸引投资主要以吸引非公经济成份为代表的民间投资为主。

2005年2月19日，经过长期而广泛的讨论之后，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重要文件（又称“非公三十六条”）。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七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中，第一条即为放宽市场准入，公平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并在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明确了改革方向和措施。这无疑为在政府财政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通过民间渠道大量吸引和鼓励民间投资，有力地推动云南区位优势的实现，促进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次区域经济产业项目的合作上，要坚持国民待遇原则，彻底消除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不平等待遇，凡是规定对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优惠措施原则上也应当适用于内资企业和民间资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电信服务业等行业。进一步开拓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的投资领域，加大对民间资本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上放宽监管和限制，鼓励民营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债券，扩大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第三节 政府在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一、第一推动力假说

政府在后发区域的发展中一般处于主导地位，并有“政府第一推动力假说”的说法。云南区位优势的实现经历两个转化：一是区位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二是低成本的初级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高层次区位优势转化。在这两个转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

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来说，经济主体要持续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有效的制度安排必不可少。只有产权明晰的制度安排才能促使经济主体具有比较优势提升的可持续性、交易效率提高的可持续性，由此比较优势才能顺畅的转化为竞争优势(如图6.3所示)。^①

比较优势、交易效率和制度安排是影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其中，交易效率的提高，不仅能发挥现有的显性比较优势，而且能将隐性比较优势显化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而交易效率提升依赖于有效的制度安排。

^① 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 理论与实证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04页。

高效率的高级区位优势持续获得需要持续的知识创新因素，包括崇尚创新和竞争的区位文化推动、智力资本的积聚、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和能迅速促成知识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企业集群（组织创新）。知识创新是区位优势的真正源泉，区位优势的生命周期的演进最终将受制于创新的力度。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将为区域持续创新形成，为区域低层次的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区位优势转化提供制度保证。这就是政府的核心任务，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

产业集聚的创新优势依托于其区域创新系统。产业集聚区域创新系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技术知识、市场信息，与外界连成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联合体，与供应商和客户保持良好的链接，从而保证研究开发、设计研制、制造工艺、生产销售的顺利进行。在云南这样一个知识创新环境并不优越的地区，政府要从长远战略角度出发，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辅之以市场机制，提供区域创新系统运转的有效制度安排，推动产业集聚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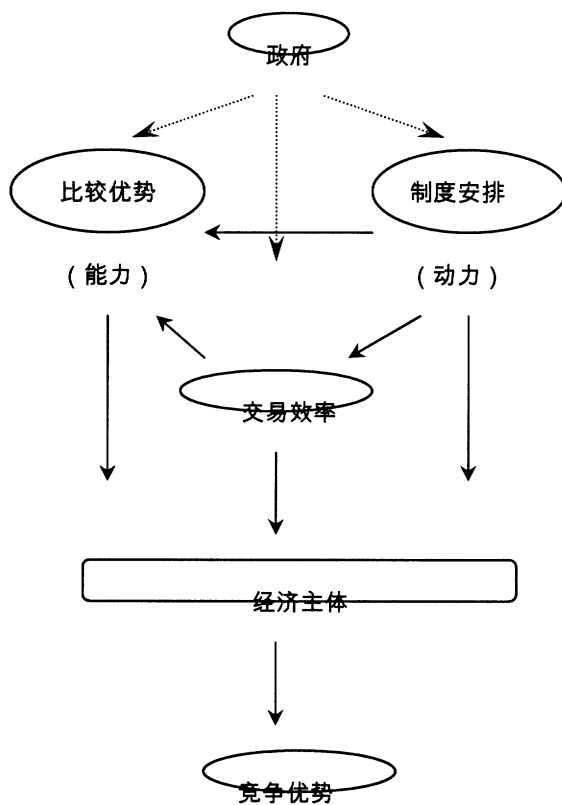


图 4.1 影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区域创新系统是指在一定经济区域内与创新全过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实现条件所组成的网络体系及其运行规律，由主体、环境和连接三个部分构成，具有输出技术知识、物质产品和效益三种功能。区域创新系统主要由参与技术创新和

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组成，并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广泛介入和政府适当参与。

区域创新系统不同于国家创新体系，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具体化。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结构有以下几大部分组成：①区域技术创新；②区域知识创新；③区域人才创新；④区域观念创新；⑤区域制度创新；⑥区域产业创新；⑦区域政策创新；⑧区域市场创新；⑨区域管理创新。如图 6.4 所示。^①

在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中，企业是区域创新的主体，大学（研究机构）是区域创新的源泉，中介服务机构是区域创新的桥梁，而政府在区域创新发挥着航标灯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政府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机制就是通过它对于技术创新活动资源配置的影响来改变技术创新的速度、方向和规模。但是，政府也增加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政府有效地干预技术创新体现在两方面，即技术创新障碍排除的有效性和资源分配的有效性。换句话说，政府只能间接地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它一方面通过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来营造创新的硬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在实施政策、计划、规划、法律法规等宏观措施的过程中，使自己由直接的干预者转变为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信息环境的建设者，进而影响着或引导技术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大学、企业、研究机构等）进行创新活动。^{①②}

二、政府的主要作用

为适应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必须从新的视角去考虑区域竞争优势的获得，这样才能使区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创造或保持区域不懈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一）纠正部分机制失灵

首先，政府直接参与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建设和经营，以纠正市场机制失灵。公共物品是存在巨大外部经济效益的产品和服务，然而由于产权界定困难或是市场交易会造资源的极大浪费等原因，政府效率导向型的提供公共产品可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尤其是在云南大通道建设重点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为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提高市场交易效率等采取的软措施。此外，一个国家要从生产要素中获得竞争优势，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能持续提升生产要素的机制，这就要求政府要重视教育、培训、技术创新和吸引省内外人才的优惠政策。

在这里，笔者就云南开发省内外人才资源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对云南来说，

^① 方创琳：《区域发展战略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72页。

^② 方创琳：《区域发展战略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74页。

要重视两类人才的利用，一是云南籍在外省求学而要返回云南工作的大学生，二是非云南籍在云南求学而要留在云南工作的大学生。对于前者，人们都说云南人是“家乡宝”，这些通过优异成绩考入省外重点高校的毕业生首先想到的是回云南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在人才交流市场，这个群体太大了，也给本省高校的毕业生形成一种压力。然而，他们的就业状况并不理想。很多毕业生为了能留在云南，学非所用，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还有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一看是省外重点高校的拒绝接受，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小单位“养”不起你。笔者以为，这些毕业生不能说比云南高校的毕业生优秀很多，但至少他们走出云南，见了世面，现在云南缺的就是这种有开放意识的人才。后者，主要是研究生这一群体。他们在省外受的教育，不排除有一部分来云南读研究生是投机性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愿意留在云南发展的，因为这里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平台，没有像北京、上海等城市存在严重的地域歧视问题。对于这两类人才，政府部门的眼光应该放长远一些，通过各种措施，增加人才储备。既然云南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服务平台，对有助于推动云南和东盟各国合作的就业岗位、就业政策一律给予优惠，为这两类人才以及云南人力资源的开发创造良好的环境。此外，在云南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对外开放中，需要一所专门性的对外经贸高等院校。这样的一所高校首先必须是国际化的，完全采用国际化学校的运作模式，采用全英文授课，以小语种为专业语言，直接服务于云南甚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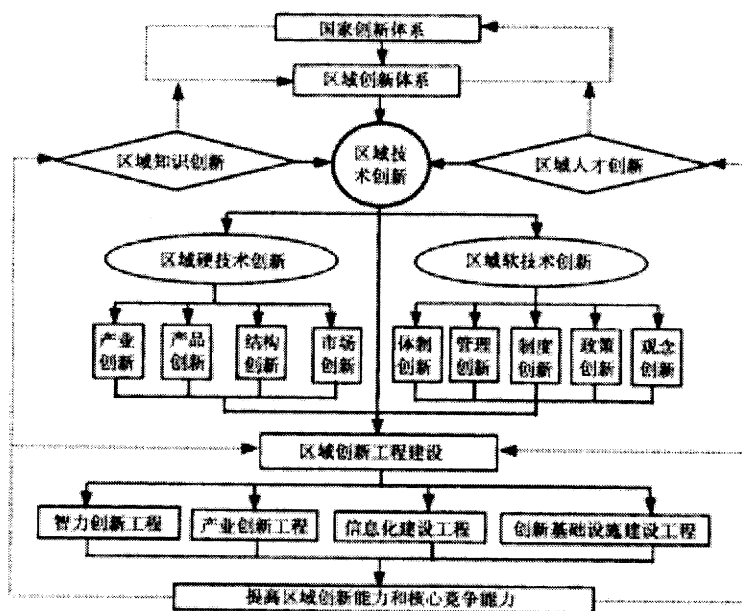


图 4.2 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框架示意图

（二）积极服务于企业“走出去”的制度措施

政府从两个层面服务于企业对外投资，一是从宏观上，通过与投资对象国政府达成政府间的多边经贸协定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企业在东道国的正常经营和正当利益提供国际保障；二是在微观层面上的支持。主要体现包括为企业对外投资做好咨询服务工作和提供金融上的支持。目前我国已与次区域五国签订了保护贸易和投资的框架协议，在框架协议的保护范围内，企业的合法经营权利得到保障。企业“走出去”可考虑四个重点：(1)在国外投资建设国内有短缺趋势的战略性资源和初级产品；(2)投资开发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3)投资云南省有竞争优势的产业；(4)通过对外投资寻求建立国际区域信息网络、商业咨询中心以及一些生产环节和研发机构。

政府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财政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在财政税收方面，对“走出去”的企业实行国外收入阶段性免税，以加强资金积累。在金融方面，以优惠贷款或适当放宽信贷额度，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适当放宽企业海外融资限制，并实行短期外债余额管理。在信息服务上，政府应在快速传达国家最新外贸政策的同时，努力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向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供求信息、次区域各国和各行业的贸易环境信息、产品标准和市场准入认证信息等。

（三）努力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是在市场行为主体的具体运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法规性制度建设为公平竞争环境的创建奠定基础。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努力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1)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上，打破地区保护主义的地方封锁，使“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化。在中国，表现为行政区区际间的经济摩擦造成的经济割据现象。这种割据造成国内贸易极低的交易效率，不利于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也就制约着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转化。所以说，当前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仍不能说是贸易强国。因此，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向“行政区经济”的转化，将是今后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方向。(2)进一步放开外贸经营权，支持中小企业扩大对外投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次区域合作，也就是打破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建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体系和融资担保公司、信用担保机构；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参加基础设施建设及兴办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中介机构等服务业；加快自身和技术创新，增加科技投入，调整产品结构；完善规范合作机制，形成有利于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通过产业发展政策，构建区域优势

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产生的产业部门，一般都能够成为主导产业，主导部门的产生是比较优势作用的结果。政府在区域优势的构建中，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安排：一是对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政策扶持；二是对主导产业的空间布局。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源于市场失灵，产业发展的目标和过程是对各产业的非均衡协调发展。因此，政府在产业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中，应有所侧重，全面协调。政府应该侧重于确定并壮大主导产业，扶植新兴产业的成长。因为市场规则并不必然的支持这些微小的未来主导产业的快速成长，政府的扶植可以防止这些新兴产业被市场竞争扼杀在幼小阶段。同时，由于产业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对那些将要成为衰退的产业以及资源型城市要进行及时的结构调整。以三大经济走廊的建设为契机，以云南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通过主导产业以及相关产业链的选择和扶持，构筑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云南产业发展格局。

（五）优化云南的法制环境框架

实施国际大通道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环境改造工程”，这其中又以营造和优化良好的法制环境至关重要。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成功经验表明：完备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云南“双向桥头堡”的通道优势，使得云南的对内对外投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良好的法治环境对改善云南的投资环境起着关键作用。在WTO规则的框架内，结合云南的特殊情况，充分利用各种合理的投资倾斜措施，建立比较稳定、统一和系统又具有一定灵活性的云南省投融资法律法规体系。要兼顾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和吸引外资以及内资两个方面的法制保障。

小结

本部分以云南“服务东盟、服务中国、发展云南”的基本思路为出发点认为，中国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应树立“战略利益观”，以此指导和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云南要发展自己，必须充分发挥“双向桥头堡”的国际大通道优势，将区位优势转化为高层次的区位竞争优势。云南要实现这个目标要进行两个转化：一是区位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二是低成本的初级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高层次区位优势转化。

围绕交易效率的提高，文章探讨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途径。首先，加强基础设施条件的建设。这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基础性条件；其次，打破地区封

锁，发展国内区际贸易，可以生成国内市场的竞争性，使企业在真正面临进口产品竞争以及国际市场之前能够得到必要的锤炼。另外，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是提高企业交易效率的有效途径。

初级竞争优势向高级区位优势转化的关键是持续的技术创新。文章认为产业集聚是持续创新因素的重要来源。首先构建了云南面向次区域及东盟开放的产业空间集聚结构。进而指出要实现云南三条经济走廊的产业集聚发展，政府必须通过吸引外国投资、外省投资，以及非公经济成份的投资，合理引导和调控，建设符合云南产业发展要求和外向型开放格局的产业集聚区，实现云南高效率区位优势。文章最后分析了政府在这两个转化中所担负的角色以及提供的制度性安排。

结 束 语

一、基本结论

通过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行分析,并提出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思路,文章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属区域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交叉应用性研究。对其研究从合作的基础、动力机制、发展组织形式、合作的重要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二)亚洲开发银行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其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次区域最重要的合作机制,也是中国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载体。

(三)“东盟意识”,具体表现为“东盟方式”,除了影响到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外,对次区域经济合作或一体化进程也产生重要影响。它是次区域合作意识形成和巩固的重要基础。

(四)作为松散的国家间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终极目标由于东方文化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形成像欧盟一样的组织形式。而且,次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在进行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两大战略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将丰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形式研究的内容。

(五)大湄公河次区域六方按经济发展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泰国处于第一层次,越南和中国云南省处第二层次,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属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属第三层次。泰国是次区域其他国家吸引外资的重要对象。在此区域范围内,可以形成“次区域投资循环圈”,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当然,我们不能静态的看待发展的三个层次,通过发挥后发优势,次区域各方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六)战略利益观是中国(云南省)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指导观。

(七)面对次区域其他国家所具有的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云南和国内其他省份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独特的区位空间优势,处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结合

部的“双向桥头堡”国际大通道优势。云南基于空间区位优势上的区位比较优势向高效率的区位竞争优势转化是现实选择。

二、主要创新

作为一篇应用性的研究论文，文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能的创新和贡献之处有：

（一）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丰富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内容，是为文章的创新之一。

（二）构建区域合作研究理论的框架体系，探索国家间区域合作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是为文章在理论上的主要创新之处。

（三）将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应用于区域优势的分析之中，探寻区位优势竞争优势实现的途径。文章指出传统的比较优势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静态的比较利益，要获得现实的区域比较利益以及持续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必须在充分发挥现有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的区位优势转化。

（四）除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外，亚行还倡导了中亚经济合作，再加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倡导的图们江流域开发合作等，这些都涉及到中国与周边的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现阶段比较成功的次区域合作形式，通过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以及提出国内的对策性发展思路，可以为中国参与其他次区域合作进程提供借鉴。这是文章最主要的现实创新点。

（五）此外，文章还提出了以下一些基本观点：

1、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繁荣发展阶段（1992年到2002年）、全面务实合作阶段（2002年至今）。

2、“东盟意识”的形成和扩展对次区域合作意识的形成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盟意识”抑或“东盟方式”在次区域形成共识为次区域合作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思想保证。

3、文章认为，推动次区域合作的经济基础力量存在内在缺陷，真正推动次区域合作的现实动力基础在于：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强烈的合作愿望和泰国的推动作用。

4、亚行的目标宗旨和次区域的区情决定了亚行发挥主导作用的必要性。

5、文章指出，诸如“次区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亚洲共同体”等目标都不能完全按欧盟的发展形式来运作，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强烈的民族性格决定着亚洲的“共同体”目标和欧盟的不一样，我们要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本地区实

际的组织形式。此外，由于此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薄弱，现阶段次区域合作属于松散的国家间合作，但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范围内，次区域合作同时在进行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文章认为，国家间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两种性质不同的合作形式同时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是次区域面临的重大问题。这种开拓性跨越式发展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6、文章提出战略利益观是中国（云南）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观，同时应成为次区域各国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利益协调的基石。

7、基于后发优势基础上的空间区位优势是云南的绝对优势。“双向桥头堡”的国际大通道优势是云南实现自身发展的基础。

8、交易效率是区位优势相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因素；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是低成本区位优势向高效率的高级区位优势转化的重要条件。

三、不足之处

（一）由于笔者学识资历不足，对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框架的构建，尤其是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投资理论的概述，逻辑上的严密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二）论文缺少对空间技术手段—“3S”技术的运用，在对产业集聚的空间分析上缺乏直观性，这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三）由于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多方、多领域，虽经过本人的努力，但国外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仍显不足。

（四）由于篇幅所限，对云南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性建议只停留在客观层面，缺少具体的实际可操作性政策建议。

（无）论文的完成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笔者自知对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还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ADB: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ticle 1, www.adb.org .

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Cooperation Pays, Conflict Doesn't》, *ADB REVIEW*, December 2004.

陈保江等:《云南正积极构建面向东盟现代化物流信息平台》[N]. 云南日报, 2007-7-24。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版。

东盟秘书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报告》(英文版)。

付晓东、胡铁成:《区域融资与投资环境评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版。

方创琳:《区域发展战略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广西“东盟热中的冷思考”》,新华网广西频道12月11日电。

古小松:《中国-东盟知识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7月29日, www.sdpc.gov.cn 。

《共建和谐“花园”,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新思路》[N]. 人民日报, 2006-10-27.

贺圣达、王学鸿、宫占奎:《CAFTA与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贺圣达:《21世纪初云南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何大明:《澜沧江水电开发对怒江开发的启示》,来源:绿家园志愿者整理,转自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2003年11月6日。

洪昆辉:《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与三条经济走廊》,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0期。

江小涓等:《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III》,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李克:《适度差距与系统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证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李启昌等：《“十一五”我省口岸建设将展现下辉煌》[N]. 云南日报，2007-8-14。

陆玉麒：《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陆荣飞等：《中国—东盟“两会”成果丰硕》[N]. 中国贸易报，2007-11-8。

卢漪、贺友华、汤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域探讨》，载《经济问题探索》，2004年第1期。

刘斌：《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1月版。

裴王月：《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受益巨大》，www.cafta.org.cn，2004年11月30日。

<泰>素帕猜·巴尼巴滴和<美>马克·克利福德：《中国重塑新世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舒庆、周克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商务部、外交部：《关于发布<对外投资产业导向目录>的通知》，2004年7月8日。

商务部：《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4年修订）》，2004年8月3日，www.mofcom.gov.cn。

唐邦勤：《云南省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与优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2000级硕士论文，2003年6月。

Washington Post, Nov. 15, 2003, 转引自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王勤：《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与前景》，载《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4期。

王定一：《区域营销—招商引资新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5日，新华社发。

温家宝：《在第十一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N]. 经济日报, 2007-11-21。

吴综之：《中国：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角色》，www.cafta.org.cn, 2004年3月9日。

俞进：《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5月版。

杨宇白、史爱萍：《积极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J]. 经济问题探索, 2002, (12), 此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城市经济：区域经济[J]. 2003, (3)全文转载。

杨宇白：《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分析》[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3, (1)。

杨宇白：《广西和云南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抢占先机的思考》[J]. 桂海论丛, 2003, (3)。

杨宇白, 胡矿：《次区域合作中云南贸易与投资战略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04, (4)。

易小准：《首届中国商务发展论坛发言词》，2004年11月27日，见www.cafta.org.cn, 2004年11月30日。

《云南省对外经济持续增长，东盟仍是最大贸易市场》[N]. 中新社, 2006-12-18。

《云南与东盟贸易快速增长》[N]. 云南日报网, 2007-1-16。

喻光继：《面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究》[J]. 东南亚纵横, 2007, (8)。

赵永利、鲁晓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载《国际经济合作》，2004年第1期，转引者：www.cafta.org.cn, 2004年5月10日。

张衍阁：《谁在投资中国》，载《全球财经观察》，2005年1月17日，见www.cafta.org.cn, 2005年1月18日。

张伟：《后发优势与贸易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张明之、乔蔚虹：《基于区位优势的产业竞争力：整合与升级》，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张小蒂：《国际投资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转引自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践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张左等：《云南与东盟国家贸易现状、问题与对策》[J]. 东南亚, 2002, (4)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性强》[N]. 广西日报, 2006-3-13。

中国东盟：《M 型战略放大北部湾经济区想象力》[N]. 第一财经日报, 2006-11-03。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越关系影响深远》[N]. 新华网, 2007-04-20。